

## 生平与创作

### 一、童年

一八七九年七月二日，正当夏收大忙季节，在匈牙利东部沙特马尔州一个偏僻乡村——蒂萨齐齐一所简陋的农舍里，一个男婴出生了，他就是匈牙利未来最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莫里兹·日格蒙德。

莫里兹家祖祖辈辈同土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祖父是被释农奴。父亲莫里兹·巴林特耕种着少量土地，但为人精明能干，雄心勃勃，在村子里被视为富有进取心的青年。母亲柏拉奇·伊丽莎白是乡村牧师的女儿，早年丧父，姊弟四人由寡母扶养成人。关于莫里兹·巴林特居然娶上柏拉奇·伊丽莎白做妻子这件事，村里人曾经议论纷纷。要知道，一个农村穷小子，竟然跟一位知书明礼的知识阶层人家的女儿结婚，在当时简直是不自量力的高攀，而莫里兹·巴林特正是以这种人们难以想像的勇敢行为使村里人目瞪口呆，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莫里兹·巴林特从妻子的陪嫁中得到比自己原有的多两倍的土地，身价骤然倍增，差不多要挤进村里大户的行列了。他精心管理自己的田产，生活美满，婚后不到两年，大儿子的降生又给这个家庭带来莫大的欢乐，孩子自然也得到特别的照料。

莫里兹·日格蒙德出生的年代，正值匈牙利处于从半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变动时期。十九世纪下半叶，匈牙利人民一方面在奥匈帝国的统治下，受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和匈牙利大贵族地主阶级的压榨与剥削；另一方面国内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就整个社会结构而言，基本上仍属半封建性质，尤其在广大农村，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势力依然占据统治地位。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向农村的渗透，农村开始出现了富农阶级。他们人数不多，作为农村资本主义的新兴力量，对妨碍其向上发展的乡村封建贵族地主很不满意，但同广大贫农和佃农又存在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并由此而产生种种矛盾。这就是当时匈牙利的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较早较快国家的一幅生动的社会生活图景。

蒂萨齐齐村是流经并灌溉阿尔弗勒德平原的著名蒂萨河支流附近的一个穷乡村。村里只有两条街，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跟外界很少来往，原因很简单，这里远离城镇，路窄难行，遇到下雨天，即使套上六头牛也难以拉动陷在泥泞道上的大车；所以村里很少有人见过世面，消息也不大传得进来，人们的视听自然是相当闭塞的。即便如此，在莫里兹·巴林特身上仍然体现出一种自发的资本主义力量。他精力充沛，兢兢业业管理自己那份增多了的土地，还同当铁匠的内弟合伙采用借贷方式买回一部旧农机，打算在村里干一番事业。不料事与愿违，他的内弟对农机不懂行，机器被弄坏了，莫里兹·巴林特很快破了产。当时莫里兹·日格蒙德只有六岁，家庭遭到的意外不幸使他过早结束了欢乐的童年。三十多年后，作家在《我的生活小说》（1938年出版）中回忆这一情景时写道：“当时我不可能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但恐惧感一直在伴随着我幼小的心灵；这一点我至今记忆犹新。”

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小莫里兹只好跟随外婆到住在伊斯特万迪村的舅舅家里寄居。离开了父母和温暖的家庭，莫里兹在新的环境里不免感到孤独和陌生。使他得以快慰的是，晚上一有空，识字的外婆和舅舅便给他读小说故事，这些美丽的故事在小莫里兹幼嫩的心房播下了文学的种子，它总有一

天要萌动的。一年后，莫里兹害了一场病，病愈后只好又回到父母身边。祸不单行，他们的家又遭了火灾，父母便搬迁到邻州沙波勒奇的柏里查村居住，主要靠父亲做木匠营生来维持家计。莫里兹的母亲是位有文化教养的妇女，性格温顺，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对子女（莫里兹共有弟妹八人，二人夭折，其余均长大成人）给予很好的教育。父亲对家庭也关怀备至，即使在外面干活干得很晚，也要赶回家过夜；有时不得不到远一点地方去干两三天活，也总是惦念着妻儿。因此，在柏里查村过的虽是艰辛的日子，富有的亲戚们从不登门，更不用说会帮助他们，但他们的家庭气氛却是和睦和热切的。

## 二、求学

莫里兹在家乡念完小学后，作为长子，父母亲不顾手头拮据，决定送他继续上学。这样，莫里兹十一岁那年，便被送到州首府德布雷森去上中学。他在当教师的另一位舅舅久拉的监护下，在德布雷森中学度过了难忘的三年半时间。

莫里兹进入德布雷森中学读一年级时，以一个来自农村学生的眼光看待城市的一切，对什么都感到新奇，可是由于不能适应学校严厉的校规和周围新的生活环境，常常独来独往，闷闷不乐。头一年，他又生了一场大病，以至久拉舅舅不得不建议他的父母把他领回家去。在家里，那种举目无亲的孤独感被父母的爱抚和弟妹嬉戏、玩耍的天伦之乐所消融。这样莫里兹的病很快就好了，而且长得比以前更壮实。

第二年，他重返学校，不料校方要他重新从一年级读起，莫里兹感到莫大的羞耻，便发奋读书，在轻易地完成作业后，涉猎了大量课外读物。到三年级时，莫里兹已经阅读了许多匈牙利重要作家如魏勒斯马尔蒂、裴多菲、约卡伊等的作品，以及当时能拿到手的一些流行英、法小说。他像个过分饥饿的孩子，无暇选择，囫囵吞枣地把食物往肚里塞。就在这个时期，他萌发了要当作家的愿望。正当他逐渐适应德布雷森的环境，父亲为了让更多的子女能够上学，又举家迁到沙罗什波托克，期望在那里作为有经验的木匠和领工，以得到更多的收入。莫里兹便跟随全家转到沙罗什波托克中学读书。在那里，怀有偏见的教员对于这个出身低微的学生抱着一种不信任感，有时甚至有意排斥和刁难。因此，在六年级上半学期考试时，故意让莫里兹的德语、拉丁语和希腊语这三个科目不及格。莫里兹对此感到十分沮丧，按照学校规定，这几个科目的成绩通不过，便会马上失去享受免费上学的权利，而家里又无法承担这笔费用，父母只好替他另想办法。

这时候，久拉舅舅正好在奇斯乌伊萨拉什城任中学校长，父母征得他的同意后，让莫里兹转学到那里去。在舅舅的严格要求和精心培养下，莫里兹在班级里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学校图书馆和久拉舅舅的藏书还给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他的涉猎面更广泛了，不仅大量阅读小说、诗歌方面的作品，同时还博览了历史、哲学等方面的著作。伏尔泰、卢梭等人的作品从思想上给他以莫大的启迪。两年后，莫里兹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

莫里兹又面临新的选择。关心他前途的久拉舅舅给他安排这样一条出路：让莫里兹谋求公费生的资格，上布达佩斯的厄德维什·罗兰大学文学院，

以便将来取得当教师的文凭。他尽管得到久拉舅舅无微不至的关怀，但在中学时的经历，尤其是在德布雷森和沙罗什波托克上中学时，那些不友好甚至是歧视的事情和场面，仍然使他很反感。更主要的是他渴望当作家的意愿愈来愈强烈，而久拉舅舅对他向往的进步思想所持的反对态度，又使他对一向尊敬的舅舅的保守观点在思想上产生了裂痕。出于以上种种因素，莫里兹断然拒绝了久拉舅舅的好意安排。

莫里兹的决定在家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父母和久拉舅舅都为他的强硬态度感到不快和伤心。要知道，他们本来对他这个长子是寄予很大希望的。也许是为了缓和这场风波，并重新燃起父母亲对他的希望，莫里兹同意折衷的解决办法：到德布雷森神学院学习。一八九九年，德布雷森神学院院长，一位留着黑胡子，仁慈、聪慧的好人，一见到莫里兹便断言：“我亲爱的朋友，您不会长久留在我们这里的……因为入学时穿着便服的人，他的心是不会向着神学院的。”院长的预言是正确的，莫里兹对神学院的一切都格格不入。那里沉闷的空气使他精神上感到十分压抑，不过，神学院的生活对于他十七年后在那部著名小说《火炬》里塑造的主人公，一位乡村青年牧师无疑是有帮助的。

是的，终身当一名神职人员，这是莫里兹无法想像的。半年后，他终于离开了神学院，为了不使家里人过于失望，同意转入德布雷森学院法律系学习，并开始给地方报纸写点小文章，从此同新闻工作结下不解之缘。同当牧师一样，将来当一名律师并非莫里兹的本意。德布雷森绝非他眷恋之地。怀着一颗勃勃雄心，他毅然决然奔赴当时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首都布达佩斯，走上一条艰难而崭新的道路。

### 三、探索

一九〇一年，二十一岁的莫里兹只身来到布达佩斯。这座熙熙攘攘的大都市，生活并不像他预想的那么美好，一切都是陌生的，他又陷入无限的孤独和寂寞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他像个“流浪汉踟躅街头时”，“除了感到体力上的疲乏外，对于未来的生活没有任何把握，希望渺茫”。

在布达佩斯，起先他到法学院听课，后又转到文学院学习了半年，最后不得不离开教室，踏进社会独立谋生。最初三年，他的生活与工作都不稳定。他当过教育部的小职员，想在大学图书馆谋个职位的希望又落空了；一九〇二年秋曾返回奇斯乌伊萨拉什中学代课一段时间，课余撰写论述匈牙利古典作家曹孔奈伊和裴多菲的专论。无论是久拉舅舅的挽留，或是他在那里对一位酒店主女儿产生的爱情，都无法把他牢固地拴在教室的讲坛上。一俟他为之代课的那位教员病愈，莫里兹便马上在十二月返回布达佩斯。

一九〇三年，莫里兹在佩斯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这一年冬天创办的《新闻报》，很快成为首都最重要的资产阶级喉舌。通过久拉舅舅一位友人的推荐，报社接受莫里兹为工作人员，开始时具体负责编写采访科学院、裴多菲研究协会和奇斯法鲁迪文学协会的会议新闻报道。莫里兹对工作全力以赴，正如后来他在报社的一位同事艾勒克·阿尔图尔所回忆的：“作为报社的新手，人们总是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付托给他最简单的工作，然而他却以最大的自信心从事新的工作。”

莫里兹精力过人，写写会议的新闻报道并不能满足他的写作欲望。他很

快又成了《新闻报》儿童副刊的热心撰稿人，发表了第一篇童话，还有为儿童创作的短篇小说、诗歌体动物故事等等。一九一二年他又把这些诗歌体动物故事收集在《幸福的世界》集子里出版。但看来他最初的创作并没有给他带来预想的成功，原因是这些为小读者撰写的作品在艺术上比较粗糙，不能适应小读者的心理，语言过于生硬，不够亲切，所以反响不大。在这期间，莫里兹还写过学术论文，戏剧评论等等，他恨不得一下子把自己体内蕴藏的烈火一起喷射出来，求成心切，竟然像个急于上路的莽汉，在前进的路上横冲直撞。

从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七年间，在莫里兹创作生涯和个人生活方面，还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因为这两桩事情影响着他的终生事业。第一件事是，莫里兹除了负责《新闻报》的工作外，还兼奇斯法鲁迪文学协会的工作，替这个协会出版的有关民俗学方面的小册子撰写介绍文章或序言。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协会准备出版一套名为“匈牙利的州和城市”丛书，有关沙特马尔州的小册子和专论则由莫里兹撰写。这就使他有可能以正式工作人员的身份，每年春、夏、冬三季抽空徒步走访全沙特马尔州。他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了解民情风俗，搜集民歌民谣，使他受益不浅，唤起了对儿时家乡的美好记忆，扩大了眼界，丰富了创作源泉。关于这一段生活，后来他这样写道：“在这五年间，我走遍了整个州的每一个村庄、农舍，它成了我真正的大学，生活的大学，作家的大学。”

一九一五年，在莫里兹个人生活上，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来到佩斯的第二年末（十二月），结识了一位小学教员胡必茨·恩格尼娅。恩格尼娅出生在一个小贵族出身的职员家庭，当时刚从中学毕业。他俩一见钟情，经过较长时间的了解，终于在一九一五年元月结婚。恩格尼娅成了他一生中惟一值得永远怀念的生活伴侣。后来，在莫里兹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以她为原型的人物形象。他称她“杨柯”。“杨柯”性格温和，心地善良，体贴丈夫，称得上是位贤妻良母。其时，莫里兹还只是一位默默无闻的新闻记者，收入微薄，婚后只能挤在公寓楼的一个房间里。来自小资产阶级家庭的恩格尼娅对此从不抱怨。她精打细算，把家庭生活安排得既符合他们的身份又很体面。他们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莫里兹有了一个能发挥创作才能的良好家庭气氛和环境。恩格尼娅对莫里兹的创作给予极大的鼓励和帮助。据说在他们热恋期间，她除了给莫里兹写过一首诗之外，没有再写过任何作品。她全心全意充当莫里兹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同时还以严厉的审视眼光去挑剔毛病，热心帮助修改，可以说是一位铁面无私的评论家。值得惋惜的是，由于出生的家庭和成长的环境不同，他们之间在气质上是存在差异的，这是造成他们后来产生矛盾和冲突的根本原因。但是排除这些个人性格上的因素，在莫里兹的创作事业上，他们觉得彼此是接近的，是需要对方的，特别是后来莫里兹失去恩格尼娅时，他更加体会到这一点。

总之，他们婚后的生活是快乐的，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一些，但精神上是愉快的，偶尔还抽空到外地去访亲问友。但是，他们的生活也不总是一帆风顺、尽如人意。一九一六年，莫里兹夫妇的头一个男孩不幸夭折，给家庭生活带来悲哀并蒙上阴影。加上这些年他虽然孜孜不倦埋头写作，但毕竟处于探索阶段，他的作品基本上没有摆脱时尚的老一套风格，没能走上真正的创

作道路。个人思想上难免有点苦恼和徬徨，好在莫里兹有一股子坚忍不拔的劲头，从不灰心，继续奋斗。在这方面，他得到妻子的全力支持。

一九一七年以后，莫里兹除了从《新闻报》得到一份虽然微薄但毕竟是固定的工资之外，为奇斯法鲁迪文学协会撰写的文章和小册子也给他增加了收入，加之妻子善于操持家务，经济上比以前宽裕了些。因此，在他们第二个儿子出生前夕，他们就迁居到铁砧街公寓楼有两个房间的住宅，还雇了一个来自乡间的小姑娘帮忙料理家务。

二十世纪初，正如政治生活领域那样，匈牙利文坛也为保守势力所把持，表面上呈现着一片繁荣景象，实际上是毫无生气，死水一潭。当然，生活是要前进的，这是任何反动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历史规律。在这种太平景象的背后，蕴藏着一股新兴力量，它必将冲破一切障碍，开创新的天地。一九一五年，匈牙利著名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奥第·安德烈（1877—1919年）的诗集《新诗集》问世了，在文艺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奥第在这本诗集及后来写的一系列诗歌中，彻底揭露了匈牙利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对这个腐朽落后的社会及其支持者发出猛烈的抨击，预示新的革命即将来临，给匈牙利文学生活灌注了新的活力。奥第的诗歌对正处在徬徨歧路上的莫里兹自然也是一种极大的鼓舞，为他的创作指明了方向。莫里兹当时说：“我读到奥第的诗歌时，心里火辣辣的，体内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燃烧。它使我产生新的力量，鼓舞我迅猛向前奔跑。”

奥第的诗歌对莫里兹最大的启示，就是作家在思想上要敢于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挣脱那种粉饰太平的官方大学的束缚；在艺术上要跟那种轶闻逸事式的脱离生活的俗套一刀两断，敢于揭示现实社会生活的本质；描写现实生活，目的在于通过对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揭露，唤醒沉睡的人们，真正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思想上的这一觉悟，使莫里兹心里豁然开朗，仿佛走到隧洞的尽头见到了亮光，蕴藏着的丰富的创作原动力变得活跃起来了。

一九一八年，莫里兹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大型文学杂志《西方》上发表短篇小说《七个铜板》。这篇约摸只有六千字的作品通过母子俩为了寻觅买一块肥皂的钱——七个铜板而搜遍家里可能找到钱的所有犄角旮旯，直到黄昏时一个过路的老乞丐施舍他们一个铜板才凑够钱数。但天色已黑，母亲无法再洗衣服，最后竟在一阵咯咯笑声中吐血死去。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展示了农村现实生活惊人的赤贫。《七个铜板》震动了整个文坛，一扫文学界沉闷的局面，像奥第的《新诗集》一样，它成为匈牙利现代散文文学的重要里程碑。莫里兹以“七个铜板”起家，一举成名，这时他正是“而立”之龄。

#### 四、作家

《七个铜板》的发表，标志着莫里兹走上真正的创作道路。一年后，取名为《七个铜板》的短篇小说集跟读者见面了。它以描写细腻、真切、生动，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戏剧冲突的新颖艺术手法，表达了严肃的阶级内容和社会主题，把匈牙利广大农村的真实面貌显现在读者面前。这个小说集在社会上引起普遍注意，但反映不一，许多人对作者大胆展现农民一贫如洗的生活和思想活动感到新奇；少数代表官方正统文学的保守分子，则攻击他歪曲生活，是自然主义者。只有奥第真正看出莫里兹创作的巨大意义。他指出：莫里兹创作的社会思想实质在于它暴露匈牙利广大农村的贫困、落后和愚昧；

指出匈牙利半封建社会事实上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绊脚石，必须把它一脚踢开。这一年秋，两位志同道合的诗人和小说家，在佩斯第一次见面。莫里兹把这次会晤描叙成“像一对恋人第一次见面时那样紧张、热烈……”他们不仅仅是文学事业上的知音，也是向落后、顽固的匈牙利老爷社会冲锋陷阵的战友。从此，这一共同目标把他们的命运联结在一起，成为莫逆之交。他们团结在《西方》杂志周围，为争取劳动大众在文化、经济、政治领域的平等权利，为促使那个保守、落后、顽固的贵族地主阶级当权的社会制度早日崩溃而战斗。

《七个铜板》的发表及同名集子的出版，也为莫里兹的创作生涯开辟了道路。这时，他决意离开工作多年的《新闻报》社，专心致志从事创作。当然，这不是说他从此放弃新闻工作，相反，在以后的漫长创作岁月里，他始终同新闻工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曾多次应报社邀请，以记者身分进行各种活动，为他的创作打下更坚实的基础。如他常说的，除了写作，他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新闻工作。

莫里兹虽大器晚成，但长期的探索和坚实的创作准备，对一个决心以创作为祖国和社会进步服务的作家来说，绝对不会是徒劳无益的。一旦找到了道路，明确了前进的方向，莫里兹身上蕴藏着的无穷创作力，就像喷发的泉眼，水源源不断地往外涌流。从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他出版了二十二部篇幅不等的短篇小说集，还不包括在这一真正创作时期所写下的许多部重要的戏剧和长篇小说在内。他的一些著名短篇小说如《悲剧》、《穷人们》、《在绿草茵上讲故事》、《春风》、《匈牙利人》等都产生在这一时期。它们突破对农村田园牧歌式描写的时尚框框，把生活在愚昧、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的贫苦农民的生活及其思想活动真切地、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它们揭示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半封建的社会关系中，农村各个阶级的动态和要求、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样严肃的社会思想主题。这也正是他的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所显示出来的强大生命力。

继一九〇九年创作并上演了以农村题材为内容的喜剧《沙利村长》之后，一九一一年，莫里兹第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沙金》问世了。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屠里·丹尼是作者着力描写和刻画的具有时代象征意义的人物。屠里是个意志坚强、能力非凡的青年农民，不安本分，极力要冲出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的封建习惯势力浓厚、令人压抑的狭小世界，可是不论在物质或情场上，他都敌不过农村封建势力的代表——贵族地主。更加不幸的是周围那些跟他地位和命运差不多的农民，对他的言行也都表示冷漠和不理解。他脱离了佃农的队伍，但始终挤不进富农的行列。他找不到同盟军；当时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妥协政策，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毫无联系，屠里最后被迫自杀乃在情理之中。这个敢于挣脱几百年来来的奴役枷锁，起来同强大的封建势力作斗争的先进分子，到头来竟得不到本阶级广大农民弟兄的支持，不禁使人痛心。作品里还非常大胆地描写了农民的性爱问题；当然屠里这种放荡的情欲，绝不是劳动农民的典型性格，因而不能不说这是这部小说不足之处。但从这部道出匈牙利农村实况的小说立即遭到保守派的攻击这一点，说明它还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保守派攻击作者不了解农村，是对农民的一种污蔑，胡说莫里兹充其量是一个二流的自然主义作家等等。

莫里兹对于攻击的言论根本不予理睬，在奥第的鼓舞和帮助下，继续沿着忠于生活和描写现实的道路前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连续发表

描写外地小城镇生活的小说《在上帝背后》（1911年）、《孤女》（1911年）、《鸽子牧师太太》（1912年）、《凯莱克·弗尔柯》（1912年）等等。其中以《在上帝背后》写得较为成功。这部小说仅从书名就给人以一种被遗弃的感受。它以一个小镇为背景，围绕一位小学教员的家庭纠纷，细致地描绘了诸如小学教师、牧师、中学生等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对生活于其中而又没有出路和希望的社会表示不满，但又缺乏改变生活环境的勇气。中学生在学业上不求上进，却去追求颓废、荒唐的生活；牧师则在合法外衣下干着卑鄙龌龊的勾当；小学教师对年轻妻子的放荡生活竟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了换取一时的表面上的家庭宁静，甚至设法去满足她的不正当欲望。总之，这部作品反映出当时匈牙利一群知识分子思想上苦闷，道德伦理堕落，暴露匈牙利半封建社会在文化上的荒芜，给人以一种毫无希望的窒闷感，从一个侧面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人们在心理上的压抑和彷徨。《在上帝背后》的问世，还说明莫里兹创作的题材并不像攻击他的人所说的那样，他只是个农民作家；而且这部小说所展示出的画面和所包含的社会思想主题，也说明作者的现实主义在进一步深化。

莫里兹在这期间接二连三地出版长篇和中短篇小说集，很快使他变成读者熟知的小说家，尽管有一些代表官方的保守人物对他不以为然，甚至仇视他，但这时不论是赞成者或反对者都不得不承认莫里兹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作家了。

创作上的丰硕成果，给莫里兹一家在物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改善。从一九一一年起，莫里兹已属于全国收入丰厚的作家之一。一九一二年，他还得到同《佩斯新闻报》签订稿酬从优的合同，许多作品在成集出版前都先在这家报纸上连载。这期间惟一的不幸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夭折了。不过，接着他们一连添了三个女儿。他们住进三间一套的公寓楼，还把莫里兹父亲原来在布达佩斯远郊区姑娘村的一所木头房子改建成带花园的砖瓦房。这所房子坐落在风景如画的多瑙河畔，从比利斯山方向送来徐徐暖风，气候十分宜人。莫里兹和他的家人常来这里居住，他的许多主要作品都是在这里写成的，这栋房屋对莫里兹的意义，甚至超过他的出生地蒂萨齐村。

恩格尼娅堪称莫里兹的贤内助。她不仅是他作品的苛刻和过分挑剔的批评者，同时能使他在他身上得到某种启示，或者说是灵感式的鼓舞。她还是一位能把家务和教育女儿们安排得非常妥帖的妻子，让丈夫一心扑在写作上面。就莫里兹来说，他在创作上的成就完全归功于个人的勤奋。他精力充沛，几乎是日夜不停地写作。据他大女儿维拉格（匈牙利当代女作家）在《我父亲的小说》一书中回忆他这时期的情形时写道：“从早上三四点钟开始，在父亲的工作间就响起有节奏的打字机声，直到早上家人醒来，有时甚至延续到午餐时才停止。每当父亲感到劳累，就躺在长沙发上憩息片刻；有时为了等候吃午餐，有时是在午餐以后，他喜欢跟小家庭的成员玩一小会儿；接着，他又投入紧张的写作，往往工作到夜深人静。”

经过一个阶段的紧张创作之后，外出旅游成了莫里兹一家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九一一年夏天，莫里兹第一次携同妻子和女儿们到西欧各国作一次较长的旅行。他们沿着奥地利、瑞士、巴黎、柏林这条路线，经过布拉格返回布达佩斯。三年后的夏天，他们又专程访问意大利，游览了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地，观赏了水上城市和风景秀丽的山区风光。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冲击了莫里兹的生活和思想。战争期间，莫里兹因心

律不齐和视力不好，未被征入伍，这当然不等于说他没受到战争的干扰。在战争开始后不久直到战争结束，他一直以战地记者身分，多次前往各条战线，深入军营、战壕同普通士兵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情况，同情士兵们的疾苦和要求，在报道中反映士兵们的呼声。战争前后，反动的匈牙利政府当局开动宣传机器，鼓吹沙文主义，进行战争叫嚣。这时莫里兹在思想上一度感到迷惑，写过一些描写暗杀的故事，却从来没有堕落到去写当时流行一时的那些低劣的“时尚文学”作品。通过战场上的调查和见闻，他很快识破政府宣传的欺骗性，愈到战争后期，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世界的非正义战争的性质愈暴露。就是在认清了发动这场灾难性战争的各国统治阶级反动面目的基础上，莫里兹才有可能于一九一六年写出像《穷人们》这样优秀的作品。作品中反映出交战双方的普通士兵认识到彼此是阶级兄弟，不要自相残杀，要团结起来一致对付统治阶级这个真理。

整个战争期间，莫里兹没有写出大部头的作品，只将这期间写的短篇小说集成册出版。直到一九一七年，他才写出了不朽的长篇巨著《火炬》。

莫里兹通过较长期的创作实践和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在思想上逐渐明确：在匈牙利，没落、腐朽的半封建社会制度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迫切需要进行一场民主性的社会改革。《火炬》正集中体现出作者这一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主题思想。一九一一年，一个名叫耳克里荃的村子，人们在谷仓举行舞会，不慎着火，因出口堵塞，造成四百名青年男女被活活烧死的悲惨事件，而官府对事件后果的轻率处理使莫里兹极为愤慨。据说他从中得到写《火炬》的启示，由于战争，数年后才写成书。

## 五、革命

《火炬》的出版表明莫里兹已经是一位思想成熟的民主主义作家，因此，在革命高潮到来时，他欢欣鼓舞地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不是偶然的。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眼看就要结束，秋天，奥匈帝国的崩溃瓦解已成定局。不管代表大贵族、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匈牙利反动政府如何玩弄阴谋诡计，也无法阻挡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群众革命情绪的高涨，前线的崩溃，士兵的反战和要求和平的意愿加快了革命的步伐。十月三十日，资产阶级革命在匈牙利取得了胜利。十一月，受到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归国的第一批匈牙利战俘创建了匈牙利共产党，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翌年三月，位于欧洲中部的多瑙盆地上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帜高高飘扬。

莫里兹当时正滞留在姑娘村的住宅里，他一听到渴望已久的革命在布达佩斯发生了，毫不迟疑，立即返回佩斯，以便亲自耳闻目睹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些风云突变，工农革命群众如火如荼的战斗日子里，莫里兹表现出一个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的革命作家的崇高品德，他既根本不同于那些对工农群众的革命行动感到害怕，甚至污蔑和咒骂劳动人民的保守反动作家，也不同于那些平日唱唱高调，到革命真正来临的紧要关头时又畏首畏尾，站在一旁指手画脚，说工农群众的行为过火了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作家。他返回佩斯后不久便投身到群众运动中去，参加各种集会，发表演说，高度赞扬无产阶级革命，认为“这将是祖国真正的胜利……，一切富饶的土地应当属于人民……，现在匈牙利开始了真正的幸福生活”。

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百三十三天里，莫里兹大力支持革命，政治立



场鲜明。这期间他写了题为《匈牙利走在和平的道路上》、《鲜花盛开》、《在匈牙利没有饿殍》等文章，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革命的赞扬，痛斥国内外资产阶级敌对分子对革命的攻击和诽谤。他特别赞成和支持苏维埃政府关于没收大贵族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政策。莫里兹作为革命作家指导委员会委员，随同各州人民委员到各地作巡回讲演，宣传土改政策，参观农民分到土地后自愿组织起来的农业合作社，为他多年的梦想得以实现感到欣慰。在文化领域，莫里兹同《西方》杂志的伙伴们发起组织魏勒斯马尔蒂科学协会，以便通过这一进步作家组织来代替被思想保守的顽固分子所把持的科学院、奇斯法鲁迪文学协会和裴多菲协会等组织，更好地完成革命所赋予作家的任务。在成立大会上，莫里兹代替重病卧榻不能前来参加的革命诗人奥第，宣读大会主席的开幕词，提出反对战争，反对沙文主义思想，主张民主政治，进行土改，建立进步的文化等等正确主张。

一九一九年二月间，莫里兹同克鲁迪·久拉、格尔杜尼·格若和沙布·安德烈一起接过《人民报》的编辑工作。这是一份农业部用五种文字为全国农民出版的每周一次的刊物，拥有广大读者。过去它主要着重向农民介绍经营管理经验，提出建议，宣讲政府法令等。他们接过出版大权后，改变编辑方针，充分利用它来宣传革命主张，介绍各地土改情况，支持农民的正义要求。莫里兹在改组后的头一篇社论里提出：我们要创建一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消灭了压迫和贫困。土地属于耕种土地的人们。

在这些令人兴奋、充满希望的日子里，对莫里兹个人来说，却遭到两个沉重的打击，一是他的战友奥第的逝世（一九一九年六月），二是他父亲于三月间干活时不幸被一根柱子压伤，死在往家走的道上。当然，这接踵而来的打击，并没有使莫里兹长久地沉沦在悲哀中，他尽量克服个人的巨大悲痛，继续跟随着革命洪流迅跑。在民族博物馆广场为奥第举行葬仪的万人集会上，莫里兹发表讲话指出：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最好的方法是用实际行动去实现诗人生前的要求和愿望，继承诗人的未竟事业，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苏维埃共和国活动的短暂时间里，由于战争动员和敌人的破坏、封锁，革命政府的财政极端困难，但仍然非常关怀莫里兹等革命作家的物质生活，尽一切可能给他们提供比较优厚的待遇。莫里兹曾多次向亲友们谈到他打算创作两部大型小说，一部是以传说中的农民英雄多若为题材，描写匈牙利农民苦难的过去和光明的未来的多卷集小说，另一部是关于当时匈牙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小说；可惜，由于客观的原因，他的这一美好计划也随着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失败而没能实现。

## 六、苦恼

由于国际反动势力的嚣张和进攻，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主观上又犯了某些错误，苏维埃共和国没能坚持下来。无产阶级专政暂时失败了，革命被反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整个一九一九年夏天，莫里兹都住在姑娘村的住宅里，陷入深深失望之中，希望事情会悄然过去；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他不切实际的幻想。尽管在革命后期，他并没有参与实际的革命活动，但反动军警并不放过他。这年八月间，他们荷枪实弹，闯进莫里兹在姑娘村的住宅，当着他的被吓呆了的妻子和三个女儿的面，给作家戴上手铐押走，投进监狱。他关

押了一个星期后，不经任何审讯，便又把他释放了。与此同时，又发生一桩令人不愉快的事，上一年春天他刚被选为正式会员的奇斯法鲁迪文学协会于八月间决定在十月召开大会，审议莫里兹和其他几位会员在革命期间的言行，由反动分子把持的大会以“站在共产党人一边”的罪名，将莫里兹和另一位作家开除出协会。

莫里兹回到姑娘村的家里后，用沉默来表示对反动当局的抗议。报社工作自然是不能再做了，他也暂时不再给报纸写文章，表示对政治保持远一点的距离。但作为作家，他从未停止过思考和构思，更没有放下过笔。不过，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他的写作活动是受到限制的，写革命题材犯禁，写现实生活题材也得小心翼翼，绝不能触犯当局。由于莫里兹已经沾上了红色的边儿，许多杂志、出版社都不敢或不愿意采用他的稿子。因此，他只好转向儿童和历史题材。

首先，莫里兹把创作的注意力转到战前时期。革命失败后的第二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永远做一个好人》（1920年出版）。这部后来被作者称之为他最喜爱的作品，以他自己一八九二年在德布雷森上学的年代为背景，描写一个刚从农村出来上学的中学一年级学生尼罗什·米西的遭遇。这部小说显然带有自传性质，作者的许多感受都通过米西的嘴说出来。

米西是一个腼腆、纯洁的孩子，离开父母来到德布雷森中学求学，他一方面对于这个管教甚严的陌生环境不习惯，甚至困惑和害怕，另一方面，对那些高年级学生用“学仆制”来侮辱低年级学生非常气愤。他仿佛生活在一个敌对的世界里，发现自己势单力薄，感到恐惧和缺乏保护。人们欺侮他，反过来又诬告他“道德堕落”“灵魂肮脏”。面对这个凶恶冷酷的世界，这个弱小的学生不免悲观失望，产生这样的疑问：“在这种恶毒的蠢人中间，真正的人还能够生活下去吗？”当然，莫里兹并没有让米西沉寂下去，米西身上具有的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给他以抵抗和鄙视恶势力的强大力量。每当他因受折磨而悲观失望时，深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美好信念又使他振作起来。他热爱他那终日劳动的双亲，尤其念念不忘的是母亲在他离家时的谆谆教导：“孩子，你一定要做一个好人，要永远做一个好人！”这使得米西在受打击和迫害面前从不灰心，并下定决心将来当“一名作家”，去教导人们热爱真理。后来，莫里兹在谈到他写这部作品的动机时说：“在米西的悲剧里，我写的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公社（指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政权）后的遭遇。”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他是通过在米西这个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善良、正直的高尚品德，颂扬革命，批判残暴的反动恶势力。鉴于当时的恶劣环境，小说写得比较隐晦、曲折，却灌注了作者的心血和感情，使读者深为感动，同时又看出作者的坚强信念，不愧是匈牙利文学中一部最美好的儿童读物。

再者，莫里兹在这期间只能从历史方面去发掘写作题材。纵然如此，也还得避嫌，如不能写多若这样的农民英雄，他只好选择十六世纪埃勒德伊地区的历史题材。大型历史小说《埃勒德伊》三部曲（第一部《神仙乐园》1922年出版、第二部《伟大的首领》1927年出版、第三部《太阳的阴影》1935年出版）他断断续续写了十几年。它以改革和反改革为中心，再现埃勒德伊公国的兴衰。这部历史小说的出现，说明莫里兹不得不放弃现实生活题材的创作，以借古喻今的手法表明自己仍是站在社会进步立场上的。

二十年代初，莫里兹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写作的。这时，同莫

里兹有过密切关系的《西方》杂志出版社濒临破产。而另一家出版他的作品  
的里格拉迪兄弟出版社自从革命以来，根本不愿意再考虑出版他的著作。那个  
一向把他视为值得尊敬的工作伙伴《佩斯新闻报》也不登载他的作品了。莫里  
兹只好另找出路，跟一家具有自由主义观点的大资产阶级出版社“雅典”挂  
钩，《永远做一个好人》就是由雅典出版社出版的。从此以后，他的许多重要  
作品都由“雅典”及其控制的报纸《晚报》出版或连载。直到三十年代末四  
十年代初法西斯分子接管这家出版社以后，作家同它的关系才告结束。自然，  
莫里兹在同这家当时惟一愿意出版他的作品出版社打交道时，最初是付出了很  
大代价的，即双方达成默契，作品的思想内容不能触犯现政权，出版社只能出  
版像《埃勒德伊》这类有一定限制范围的历史题材小说。形势所迫，莫里兹  
别无选择，只好接受这种条件，但心里一直很矛盾，大概这是这部小说拖了多  
年才告竣工的原因。

这期间，莫里兹应戏剧界和报社之约，为正在上演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写  
评论，这既非他所长，又不能畅所欲言，所以这些应景文章并没有什么出色之  
处。这时期值得一提的，倒是他喜欢经常在国内到处走动。一九二三年夏天，  
他在女儿们的陪伴下，在阿尔弗勒德大平原地区作了一次长距离的旅行，给一  
向生活在大都市的女儿们指点和介绍他儿时生活的世界、平原村庄的风土人  
情和自然景色。他自己身边也总是带着笔记本和铅笔，把沿途所得观感和同  
人们交谈的内容详细记录下来。这些记得密密麻麻的小本子，大大丰富了他  
的创作素材，成为他取之不尽的源泉。莫里兹写作速度之快，几乎达到惊人  
的程度，每当他酝酿成熟动笔时，故事、人物在他的笔下有如泉涌，因此他  
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是一气呵成，这当然同他平日不辞辛劳搜集大量材料，  
熟悉作品人物分不开的。

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莫里兹从苦闷中慢慢恢复了元气，创作活动又逐  
渐活跃起来。他没有向反动当局屈服，也不为大贵族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  
动统治暂时趋向稳定和巩固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反而更认清了统治阶级中间  
的尔虞我诈，以及日益变得严重的社会危机。于是，他的创作题材更为广泛，  
思想倾向更为鲜明，形成了一个新的创作高潮。《破晓》（1926年出版）、  
《老爷们的欢宴》（1927年出版）等作品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就作品所表现的主题思想而言，《破晓》和《老爷们的欢宴》是有它的  
连续性的。《破晓》把戏剧性故事紧凑地压缩在一个晚上。人们在尼里伯爵  
的庄园里庆贺庄园管理人伊斯特万的生日。可是晚宴开始时的愉快、欢乐气  
氛很快被各种隐伏的纠纷和矛盾搅乱了，跟着传来伯爵已把庄园典押给一个  
维也纳商人的消息。这帮靠剥削农民过活的乡绅们的幻梦也随之破灭，然而  
出于一种走投无路的变态心理，他们反而更疯狂地寻欢作乐，直到“破晓”  
才停止。作者在这里透过对统治阶级人物在精神、道德上彻底堕落的揭露，  
向读者指出，这个阶级已经走向灭亡，即使出卖亲生女儿，也无法起死回生。

《老爷们的欢宴》把《破晓》的主题思想进一步发挥。故事发生在一个  
名叫沙克马里·佐尔坦的贵族地主庄园里。面对资本主义的迅速扩展，沙克  
马里意识到无法再按照旧的模式生活下去，便企图仿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营  
方式改造他的庄园，因而同那些守旧人物发生冲突，又无法同金融资本抗争，  
加上个人在情场上的失意，既不能和妻子住在一起，又不能和她离异，而他的  
情妇也抛弃了他，到城市去找出路了。他无路可逃，在连着三天纵饮之后，  
在“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极其压抑的气氛里，点一把火烧毁了庄园，同喝

得醉醺醺的高朋贵友围着熊熊燃烧的房子狂舞，最后在“我们已经被宣判死亡！”的绝望声中开枪结束了自己。从莫里兹的创作思想来看，这个时期他所写的作品的确表明他已认识到千百年来贵族地主阶级赖以生存的封建社会必将走向毁灭的铁的事实。但从他对作品里主人公的悲剧下场所流露出来的淡淡的哀愁和痛心，也说明作者仍然没有彻底摆脱革命失败后心中留下的失望情绪。他个人思想发展和艺术创作上的现实主义还有待继续深化。

这期间，莫里兹个人的家庭生活也出现了意料不到的变化。一九二四年间，他的剧作《麦穗》在佩斯的民族剧院上演，一个偶然的机，他结识了美貌的西莫尼·玛丽亚。她是当时红极一时的演员，在他们相互通信过程中，渐渐超越友谊的界限，吐露了彼此爱慕之情。于是，同西莫尼·玛丽亚的关系在莫里兹的家庭里引起巨大的风波。莫里兹由于气质上的不同，原来就跟妻子存在一定矛盾，现在又出现了第三者，这就必然加剧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的破裂，促使他们的关系愈来愈恶化。但是，严格的道德观念使莫里兹绝对不忍心马上抛弃“糟糠之妻”，另找新欢而不受到良心的谴责。因此，他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中，常常外出，希望变换一个环境，通过紧张的写作，暂时忘掉感情上的苦恼。他经常到他熟悉的德布雷森去，可是，在那里并没能使他摆脱旧的烦恼，反而陷入另一个女人的情网。这一年年底，莫里兹在德布雷森又结识了一位比他年纪小得多而又风流的寡妇，很快对她产生了爱情。

这时候，莫里兹的妻子“杨柯”在思想上也处于极其痛苦之中，她是一位道德观念比较保守，内涵较深而自尊心很强的女性。二十多年的共同生活，她深知同丈夫不和谐的一面已经发展到不可能妥协的地步，可是，她又不愿意给丈夫带来更大的痛苦。出于一种自我牺牲的绝望感，“杨柯”先后两次轻生。不幸的是，她在一九二五年四月间第二次自杀时，因抢救无效而死去。妻子的死，使莫里兹感到愧疚和莫大的悲恸，为了摆脱内心的哀痛，他料理完后事，便携带女儿们先到意大利北部，后又到斯洛伐克地区作一次较长时间的旅行。

这次旅行回布达佩斯后不久，莫里兹终于下决心跟德布雷森那个年轻寡妇断绝了关系，而同西莫尼·玛丽亚的来往却越加频繁，第二年的夏天，他们便正式结婚了。

随着莫里兹在创作活动方面的进展，他同文艺界进步作家的接触日渐增多。这时期《西方》杂志也逐渐摆脱了前一时期的困境，再度活跃起来。当然，团结在《西方》杂志周围的作家，既有思想进步、主张走现实主义道路的如莫里兹等，也有代表资产阶级各种文学流派的，其中最突出的有主张艺术至上的一批文艺家，其代表是诗人、评论家波比茨·米哈依(1883—1941)，他们在促进社会文化进步这一大前提下团结在一起，向保守、落后的封建文化开战。一九二九年，当时的《西方》杂志负责人奥什瓦特·艾勒纳自杀，编辑部的重担义不容辞地落在莫里兹和波比茨的肩上。他们商定共同负责编辑部的工作和物质管理方面的事务工作。但是，他们之间因创作道路和艺术观点不同，妥协是暂时的，其实，在他们合作的瞬间，已埋伏下破裂的危机。

参加《西方》杂志编辑部工作使莫里兹的社会活动更频繁，工作量更大。一九三一年间，除了写作，他还多次应邀到外地去作演说和访问。然而，他同波比茨的矛盾却常常使他苦恼，个人之间的友谊并不能掩盖思想上的分歧。随着波比茨的思想愈来愈右倾，莫里兹更加怀念同奥第建立在战斗目标

一致基础上的真挚友情。一九三二年底，莫里兹终于决定离开《西方》杂志社，让波比茨一人独自负责编辑部工作，以便至少还能维持彼此间的私人友谊。

从小说《永远做一个好人》开始，到以优秀长篇小说《亲戚》（1930年）作为结束，莫里兹这一创作期约经历十年时间。

莫里兹这个时期的创作活动是在革命失败后开始的，经历了革命低潮，反革命政权的加强，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法西斯势力的崛起。作为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的现实主义作家，莫里兹始终坚信人民的力量，站在劳动人民一边，逐渐克服革命失败后产生的某种悲观失望情绪。因此，他这一时期作品的题材更加广泛，对旧社会的揭露批判更加有力，作品的主题思想具有更深刻的思想意义。

## 七、孤独

莫里兹在三十年代的创作活动，继长篇小说《亲戚》之后，又出现一个新的创作期。一九三二年，他刚把在报纸上连载的《亲戚》加以修改，加强揭露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描写部分，着重叙述劳动人民的贫困，交付出版社出版，接着又动手编辑出版反映匈牙利广大农村面貌的《野蛮人》这部短篇小说集。

就创作的环境和物质条件而言，像莫里兹这样知名的多产作家，生活理应相当优越，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时期，他失去了勤俭持家的“杨柯”，娶了一位很会花钱的娇妻，加上莫里兹为人慷慨，对于亲友的求援总是有求必应，从不拒绝。另一方面，他的收入又不如以前优厚，原因是一九三三年雅典出版社和《晚报》负责人米克洛什·安托尔逝世后，接手的是一位既无才学又嫉贤妒能的作家费勒迪·米哈依。他不仅限制莫里兹作品的重版，而且不履行原先同莫里兹签订的协议，单方面压低稿酬。收入日见减少，开销却不断增大，莫里兹不得不更多地关心家庭的物质利益，惟一的办法是增加工作量，拚命写作。正是在这种压力下，他又拿起放下多年的历史题材小说《埃勒德伊》第三部的写作，并于一九三五年出版。

除了以上这些外部原因外，这期间家庭生活里出现的紧张关系，也使他精神上愈来愈不愉快，备感孤独。莫里兹第二次结婚后不久就意识到，他得到的并不是一位像原配“杨柯”那样对他的生活和创作灌注全部感情的伴侣。玛丽亚是一位着意生活享受、爱打扮和出风头的女人。她像一个陌生人那样生活在莫里兹身边，不会照料莫里兹，也不关心家庭生活。剧院的生活琐事和喋喋不休的言谈并没有使莫里兹在创作上产生任何灵感。她很少，甚至从不过问莫里兹的工作。随着时光的流逝，彼此在感情上开始逐渐疏远。莫里兹这时才更加怀念“杨柯”，深深懂得“杨柯”在他创作活动中的重大价值，认识到惟有“杨柯”才是他终生不可缺少的伴侣，因而更感到羞愧和内疚。莫里兹同玛丽亚维持着表面上过得去的关系，但在思想感情上却同路人一般。玛丽亚忙于她的演出和应酬，而莫里兹愈来愈感到自己只能跟打字机结伴，只有在埋头写作时，思想上的苦闷才得以转移，感到暂时的轻松。在这期间，他的女儿们都相继长大成人，两个大的出嫁了；一个嫁给原先是诗人的书商，一个嫁给同行——男演员。晚年，莫里兹在缺乏家庭温暖的生活中感到难以忍受，几次想离开布达佩斯，住到姑娘村的住宅去，但考虑到必遭

玛丽亚的反对而搁置不提。一九三六年底，莫里兹才最后下决心到姑娘村去长住，此去直到逝世没有离开过。

人到晚年，更想念自己的故乡和儿时的生活。莫里兹这期间的创作又回到他熟悉而又喜爱的农村广阔天地里去，写出了许多优秀的儿童题材短篇小说，如《两只小狗的争吵》、《邮递员》、《二月在庭院，夏日在何处？》等，同时也是他撰写童年时期自传体小说《我的生活小说》的前奏。

一九三五年，莫里兹除了出版大型历史小说《埃勒德伊》的第三部《太阳的阴影》外，还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幸福的人》。这部小说一九三二年先在《佩斯日志》报上连载，后又修改成书出版。三十年代初，匈牙利农业危机达到顶点。他的一位名叫尤奥·久尔吉的远房亲戚从老家来到编辑部，要求“叔叔”听他叙说他一生的经历，并宣称那将是一部“美好的小说”。莫里兹说，《幸福的人》这部小说正是应尤奥的要求而写的。小说采用尤奥自述的方式，缩短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淋漓尽致地叙述劳动农民受剥削、奴役和屈辱的痛苦生活。尤奥原先是一位心地善良、热爱劳动、机智聪明的农村青年。可是，由于一时的疏忽大意，在礼仪方面他得罪了村里的上层人物，为此招来一连串的刁难和报复，几乎使他和他的母亲陷入致命的贫穷。残酷的生活现实使他最后变成沉默寡言、谨小慎微、委靡不振的庸人。他从自己痛苦的经历中总结出一条教训：“任何人，任何事情都会给人招来横祸，穷人对连鸟儿都不在乎的事情也得小心应付。”尤奥把这当作生活的信条，心甘情愿过一辈子穷困潦倒的生活。然而作者却给小说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幸福的人》。这样，读者会从作者不加着色、娓娓动听的叙述和人物的结局中自然而然地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这就是尤奥在霍尔蒂反动政权统治下的幸福，那么，他的不幸又是什么呢？

一九三六年，他的另一部著名长篇小说《强盗》脱稿（也译《山盗》），于第二年出版。

一九三八年，他经过多年酝酿才写成的《我的生活小说》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这部小说写的是作者的童年生活。它以细腻、生动的笔触，洋溢着作者真挚的思想感情，使读者从中了解到一个生长在农村、家庭屡遭变故的孩子对生活的感受。小说的文笔自然、流畅，不仅对了解莫里兹的家庭和童年，而且对了解作家所处的时代也很有价值，是一幅清晰的时代画卷。它是莫里兹成功之作，也是读者很感兴趣的一部富有生活气息和诗意的小说。

## 八、晚年

随着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同他们沆瀣一气的匈牙利反动政府把自己拴在法西斯德国的战车上。欧洲上空战云浓聚，在匈牙利，法西斯统治日愈严酷。一九三九年末，法西斯政府强行接收《晚报》，撤销了同莫里兹签订的合同，而莫里兹在其他报纸上发表作品也愈来愈困难了。更为严重的是，雅典出版社这时因种种原因债台高筑，影响了莫里兹小说的出版和收入来源。

一九四一年，莫里兹接过《东方人民》杂志，独自负责编辑和出版事宜。他的工作非常繁重，常常不得不在外出访问途中从事编辑稿件和考虑组稿问题，还要挤时间完成长篇小说《孤儿院的孩子》。这位勤奋的笔耕者，虽然年过花甲，还精神抖擞从事创作，仿佛他有取之不尽的精力，写不完的题材。

他说：“就在这一分钟，《孤儿院的孩子》脱稿了。正好是午夜时刻，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之后又将发生什么事情呢？这里又将要有一部小说，我又要写一部小说！这就是一切……”果然，这一年他又完成了准备多年的大型长篇小说《罗若·山陀尔》第一卷。

《东方人民》杂志不仅介绍外国作家和作品，同时也成了莫里兹热心团结和培育年轻作家的阵地。一切后来有成就的、从三十年代起就以描写匈牙利农民生活为己任的“民粹派”作家，当时无不受到莫里兹的关怀。在新兴起的“民粹派”作家中间，思想上并不都是一致的，他们在“民粹派”究竟是“精神或者政治运动”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和争论。以艾勒德伊·费仑茨和达尔瓦什·尤若夫为首的一部分左翼分子，主张建立为实现贫农的政治目标而奋斗的政党；另一派则主张所谓“精神自卫”，把“民粹派”运动局限在文学创作范围，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费若·格若和涅梅特·拉什洛等。莫里兹始终抱不介入态度。于一九四一年底出版的一期《东方人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摒弃政治，从事建设”的口号。诚然，这个口号是偏右的，但总的来说，《东方人民》杂志基本上为“民粹派”各种观点的作家提供了精神讲坛。

《罗若·山陀尔》第一卷问世后，莫里兹在一九四二年初又完成了《罗若·山陀尔》的第二卷。它以匈牙利南部塞格德地区为背景，全面描写了十九世纪上半叶匈牙利广大农村生活和农民同贵族地主阶级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可以说是一幅纷繁的真实社会生活图景。

小说的主人公罗若·山陀尔同《强盗》的主人公约尼一样，也是一个绿林好汉，但他比约尼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据说罗若·山陀尔确有其人，他的事迹如同我国的梁山好汉，在匈牙利民间流传甚广。莫里兹使罗若·山陀尔这一人物处在一系列矛盾斗争中，再现了十九世纪波及整个匈牙利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画面：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从上而下的解放农奴运动是不彻底的，因为名义上获得解放和人身自由的农奴并没有得到土地，农民和所谓释放了的农奴仍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被迫为自身的生存而起来进行反抗；一八四八年由中、小贵族知识分子领导的自由斗争，由于没有发动农民群众参加，显得软弱无力，最后以失败告终。以作者写作这部小说的年代来说，当时正当欧洲法西斯极其猖獗之际，莫里兹显然已不是为了写历史小说而写《罗若·山陀尔》。他是借古喻今，提醒人们：只有同人民在一起，才能有效地保卫国家和捍卫民族独立；当前，反对法西斯的斗争是关系到匈牙利民族兴亡的重大问题。

莫里兹由于长期忘我地工作，疲劳过度，满六十岁时，曾因患轻微脑溢血一度住过院。医生要他注意休息，但他出院后，根本顾不上休息，又马上拿起笔杆子从事紧张的写作。他还经常来回奔波于姑娘村、布达佩斯和德布雷森之间。事实上，出院后他做的是超过两个正常人的工作量，这大大损害了他的健康。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莫里兹有一次曾很伤感地对家人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掉了十六磅肉。这回我再也等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不幸，他这一预言竟成了现实。就在法西斯统治最黑暗的年月，即一九四二年八月底的一个晚上，莫里兹突然又患脑溢血，经医院抢救数日无效，于九月四日清晨永远闭上了他那双炽热、明亮的眼睛，他那颗一生为人民写作的火热的心也停止了跳动，享年六十三岁。官方对莫里兹的逝世表示冷淡。

然而，当噩耗传开，正直的作家和广大群众无不为之悲恸，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墓地向这位为劳动大众永不知疲倦地写作的伟大作家告别。

## 九、结束语

莫里兹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匈牙利最著名的小说家，以他获得成功的众多的现实主义作品，推动了匈牙利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为现代匈牙利散文文学奠定了真正现实主义基础。莫里兹喜欢把自己比作“说真话”的人。无怪乎努力去熟悉生活、反映社会生活真实面貌，成为这位一生坚持探索生活真谛的小说家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主要特征。他说过：“一个作家愈是伟大，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他就愈肩负着重大的任务，那就是直言不讳地道出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义务。”莫里兹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所以能够较全面地揭示他所处时代的面貌，是同他对他生活的时代有较深刻、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分不开的。他常常开玩笑地把自己比作“旅行经纪人”。他到处有熟人，特别是在农民中有更多的熟人。对于这些“相识”的生活、苦恼和问题，他了解得十分细致、深入。所以在他的笔下，这些人物栩栩如生；而统治阶级同广大劳动群众的矛盾和冲突是这个时代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在他的作品里都得到艺术的反映。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主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对生活和社会底层的被剥削受侮辱的劳动农民给予深厚的同情，并通过他们的悲惨命运和遭受的非人待遇对没落的半封建匈牙利社会提出严正的谴责，喊出他们要求革命和变革的正义呼声；另一方面，对于上层统治阶级人物的阴险毒辣、胡作非为、愚蠢傲慢以及生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也给予无情的揭露和嘲弄，暴露了当时社会的深刻危机和反动统治阶级注定灭亡的历史趋势；对于那些思想动摇，行动怯懦的中、小知识分子，也加以鞭策。总之，莫里兹对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及对统治阶级的残暴的揭露和批判所持的坚定态度，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斗争精神。

莫里兹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在艺术创作上勇于打破旧框框，进行艺术创新，在人物的典型塑造，故事情节的构思和安排的戏剧性效果方面，都同作品内容的内在发展保持和谐一致，大概是要同严峻的现实描写相适应，作品里很少对自然景物的抒情描写，这方面尤以《亲戚》最为典型。严寒和酷暑、昏暗和霉雨、耀眼和刺耳倒是衬托出作品主题思想的严肃，这些可以说是莫里兹独到的艺术风格和描写手法。匈牙利农村生活和农民题材在他的一生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分量，但是莫里兹绝对不是一般的所谓农民作家。他的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各阶级的典型人物都在他的作品里出现过，这就使得他的作品能艺术地再现当时的社会生活的真实。正是从这一角度，莫里兹以他毕生的创作把匈牙利现代的散文文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中国读者说来，莫里兹并不是一位陌生的外国作家。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作品相继得以介绍到我国来。目前，他的作品被译成中文的有：《火炬》、《莫里兹短篇小说集》、《孤儿院的孩子》、《亲戚》（根据原著改编的剧本）、《七个铜板》、《在上帝背后》、《强盗》等，另外，在各种报刊杂志上还有一些评论和介绍莫里兹及其作品的文章。总之，我们中国读者从这位毕生辛勤写作的作家的作品中，不但可以了解到居住在欧洲中部——多瑙盆地的匈牙利人民昔日的斗争生活，同时也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和艺术借鉴与



享受。

## 主要作品内容简介

### 《火炬》

《火炬》是莫里兹创作前期最重要的作品，写成功于一九一七年。这时正是匈牙利一九一九年革命的前夜。《火炬》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天气非常闷热，太阳把大地烤得快焦灼了，仿佛这个世界就要融化了似的。

莫萨村的加尔文教牧师狄柯尼夫妇和女儿玛妲都心急如火，等候贵客。狄柯尼想趁邻村法比法尔新上任牧师路过此地时热情款待他，并相机为女儿物色个乘龙快婿。狄柯尼是个乐天派，善于管理自己的田产，尽管对食欲从不节制，可也从不生病。该得的东西他从不放过，不该得的他也从不伸手。

他们终于把新牧师马托尔奇·米克洛什盼来了。他是一位很俊美的年轻人，高高的身材，长着一双棕色的眼睛，留着棕色的唇须，双颊红红的，身上穿的那件教袍沾上一层薄薄的尘土。

“多漂亮！多么帅的美男子啊！我真的爱死他了……”玛妲对他一见钟情。

这时，狄柯尼太太已经把年轻牧师和一大群护送的农民接进屋里，看见玛妲那副热情奔放的表情，几乎脱口而出：“他不是给你的，傻丫头。”她仿佛觉得眼前这位年轻人是她朦胧地想像着的情人。

“亲爱的朋友和同事，”狄柯尼牧师在致欢迎词。“你刚从知识神庙里来，……你是来给那些不幸的孤儿寡妇做灯塔的，给这个充满眼泪的幽谷做照明的火炬的……亚们。”

马托尔奇毫不迟疑地用清晰的声音致答：

“我亲爱的兄长和列位教友，听到这些对我鼓励的好话，我深感不安……我完全明白我的责任……是的，我祈求全能的上帝赐与我火焰一般的热情，使我成为一个火炬……，”青年牧师激动地接着说：“我要为全人类的文化与正义而工作……做一个照亮永恒真理的火炬，……直至烧完变成灰烬……”

新牧师马托尔奇由教区理事维洛和一些头面农民簇拥着走进法比法尔村。整个村子沉浸在一片欢乐声中。人们在维洛家的院子里搭了一个棚子，从黄昏开始，那些川流不息来到这里的村民拚命吃呀、喝呀，到午夜时分就更加放肆了。他们仿佛吃了这一顿之后，要等到选举下一个牧师时，再吃不到东西似的。

“谁付账呀？”青年牧师天真地问。

“这你不用担心，尊贵的牧师先生。”维洛虔诚地回答。

但是，叫马托尔奇不安的是，那些农民不仅叫嚣、酗酒、戏谑，还唱宗教所不容的放荡下流歌曲。他本想站起来对他们大喝道：“停止这种荒唐行为！”可是，他改变了主意，领着大家唱上帝的赞美诗。

第三天早晨他醒来时，阳光已经照进窗子。正当他为自己已成为这间屋子的主人高兴时，维洛和村文书已在过道里等候他。牧师向他们打听村民对前天他的就职典礼是否满意时，维洛说：“这些人永远是满意的。”

马托尔奇满腔热忱，把他的美好计划告诉他们，并表示他要把一生贡献给这个村子；如果有谁需要得到安慰，请到他这里来，他愿意做他们的顾问、

医生和朋友。他不愿意村子里人与人互相吵架和仇恨，愿意帮助人们学习彼此相爱，这样，这个地方就会有和平和博爱，过和睦而理想的生活。

维洛和文书听得有点不耐烦，直截了当告诉他，他们是来跟他结帐的。马托尔奇还以为他们是给他送薪俸来的，格外高兴，因为他是个穷学生，虽然过着节俭的生活，仍欠着一些债务。他们把单据拿出来，对他说，就职典礼的费用统统由新牧师支付，这是老规矩。何况他这次之所以能来此地当牧师，完全是靠他们花钱运动的。还威胁他说，他的前任牧师不识抬举，告到主教那里去，逼着村民自己掏腰包，结果不到一年工夫，只好卷铺盖走了。马托尔奇害怕丢掉新谋到的职位，再回神学院去与贫穷斗争，受到才学大大不如他的同学们的讥笑，忍辱在账单上签了字。

教堂的头面人物就这样从马托尔奇身上榨取了半年的薪俸。马托尔奇本是怀有高尚理想、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抱着改革社会的雄心走出神学院的大门。没料到一上任，他就遭到这些人世间的渣滓的敲诈勒索，不禁在愤怒中咒骂他们。他可以躺在床上不出门，可是饥饿难忍，身无分文，只好拿起帽子和手杖，到村里的小学教师那里去。他以为公职人员应当合作对付这些可恨的农民（书中的农民实际上是指富农）。他期待着小学教师会留他吃顿晚饭，借点钱粮给他度过难关。

小学教师夫妇告诉他这里许多农民欺软怕硬的变态行为，使他对现实更寒心了。然而马托尔奇不满意小学教师对匈牙利农民的诽谤。深感他们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再加上小学教师被迫娶的胖太太，本是农家姑娘，俗不可耐，还对他动手动脚的，只好匆忙告辞，到野地去找些酸浆果充饥。

马托尔奇头脑里装满了神学，缺乏的是生活的经验。他出身于牧师家庭，从父亲追溯到他记不清的世代，都是牧师。母亲常常跟他讲述那些先辈的行迹，他们如何告诫子辈敬畏上帝和爱护世人，服从师长，尊重别人。虽然他心里充满这些高尚思想，但他的胃却提醒他，现实世界并不那么美好。他难免沉浸在矛盾之中。他决定就他对宗教的一些新见解撰写一篇论文。他有了目标，腹中的饥饿似乎也减轻些。于是他顺手从田里掰几个玉米棒子，在黑暗中走回家去。

一天，马托尔奇去拜访狄柯尼，碰巧只有狄柯尼太太一人在家。狄柯尼太太自从第一次看见他，就贪婪地爱着这个既天真又可爱的小人儿。她温柔而迷人地微笑着听他讲家世，心里想，如果他不是有心于她，一定不会对她推心置腹地说出这些体己话来。她比马托尔奇的母亲稍大几岁，却在寻思：“我还不到五十岁，还不算太迟。”于是狄柯尼太太便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他。原来她也是出身于高贵的世家，父亲同首相过从甚密，弟弟们在维也纳贵族学院受教育，她本人曾在布达佩斯著名女子学院上过学，坐的是四轮马车，还有保姆陪伴。她父亲是大名鼎鼎的牧师，在两次大主教竞选中遭到许多敌手的诽谤和攻击。他受不了，便自杀了，那时狄柯尼太太才十二岁。后来，她又受到第二次打击。她是跟她的情夫乘坐一辆借来的四轮马车私奔的。那时他们喝酒、热恋……早晨他跪在她面前，在地板上磕头，晚上却把使女弄到餐桌上逼着她坐在那里看他拥抱、亲吻使女。狄柯尼太太脸上挂着泪水说：“现在又碰上这样一个灾难，这是第三次了……”

听到狄柯尼太太的这番话，年轻牧师以极深切的同情心看着她，准备把她抱在怀里给她擦干眼泪。他于是同意留下来，把他早上刚写完的有关圣经的文章念给她听。狄柯尼太太便伸出手来按住了他那只搁在桌上的手。马托

尔奇告诉她：

“倘若我把这篇文章发表，必定会招来德布雷森神学院里那些人的反对，虽然它里面并没有革命思想，不过是一个饥饿的小牧师的一些陈腐想法罢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或推翻教会。”

狄柯尼太太立即走进里屋，出来时说：

“我真是简慢的女主人。使女马上就送茶点来。”

“我刚才说我是个饥饿的小牧师，”他脸红得像燃烧的火炬，讷讷地说，“可不是这个意思。”

“可是我理解的正是这个意思。”她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

说话间，一个美丽的使女送来茶、乳酪和美味的蛋糕。他用又饥又馋的眼光盯着使女和食物，恨不得立刻扑到那些食物上去。

狄柯尼太太见他吃东西时不作声，手也抖动得厉害，心疼他生活得艰苦，便想出种种借口吩咐使女拿来各种精美食物，让他吃个饱。他象一头饿慌了的狼把所有的东西吃个精光。当他喝完最后一杯酒时，说出了实话：自从到这里当牧师四个月来，不曾吃过这么多美味的食物。马托尔奇已经把狄柯尼太太当作自己慈爱的母亲，把上任后被维洛等人讹诈了半年的薪俸，只得靠借高利贷维持饿不死的生活的痛苦经历全告诉了她。狄柯尼太太用手绢拭着眼睛，站起来，走到他面前，忽然用两只手搂住他的头，在他嘴唇上接了个吻。他通身打了个寒噤，一个老女人的接吻，他一想到这里就觉得悚然。他本想跑开，但一想到她对他可能会有所帮助，便妥协了。

这时玛妲年轻的声音在外面响了起来，马托尔奇感到心头一松。狄柯尼太太趁玛妲还没有进来，含着泪对他说，造成他不幸的原因不是上帝、也不是维洛，而是那个在背后支使维洛的人。

“他害了我的一生，玷污了我的贞操……这个卑鄙的恶棍。他为什么还要迫害你呢？”她眼睛里闪着亮光，沉思着替他报仇。

马托尔奇虽然听不懂她的话，但出于一些神秘的原因，他想起了村子里的地主阿尔达伊男爵。

“他掌握着一切，”她接着说下去，“有钱有势……可是他是个贪婪的畜生。”

马托尔奇热情地望着她，觉得又爱起她来了，正因为她已年老色衰而更加爱她了。他以一种不止于肉体关系的爱情来爱她，因而有点怀疑起自己，刚才到底是不是真的曾经厌恶过她的接吻。

年轻、风骚的玛妲一进来，狄柯尼太太就发现马托尔奇很爱看玛妲撒娇的样子，爱听她喋喋不休的闲话，而且显得精神抖擞，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把话题引到新来的女教师玛琪的身上。她向他介绍玛琪是位十全十美的姑娘，有个性，既文雅，又聪明，又庄重，懂得怎样当心她自己。马托尔奇心头一闪，仿佛这个玛琪就是这个老女人想利用来迷惑他的一股神秘的力量，把他引到另外一条路上去。他对未来的一切希望和被狄柯尼先生鼓励起来的对自己能当火炬的信心，现在都混合在对这个与众不同的玛琪的爱慕里了。

吃过晚饭，狄柯尼先生告诉马托尔奇，匈牙利仍然是贵族地主阶级的天下，虽然上千年来他们都没有学会怎样种地，可是却学会了怎样统治。他们享有世界上的一切特权，连医生和牧师都是他们的仆人，得乖乖听他们的使唤，否则就会遭到可怕的报复。

马托尔奇对狄柯尼先生的话并不太在意。他的心思已转到玛琪身上，怨恨起狄柯尼太太没有请玛琪来吃晚饭。就从那一天起，他失去了对人类的仁慈的信心，不再相信狄柯尼先生对农民的热爱，也不相信狄柯尼太太对他的生活的关切。

马托尔奇早晨醒过来时，不免为留在狄柯尼牧师家过夜感到后悔，他担心大白天回去，会给那些看见他的农民留下话柄。狄柯尼母女用丰盛的早餐款待他。就在玛姐为他安排车子离开餐桌时，狄柯尼太太把一小包金币塞进他手里，以一种不可违抗的口气说：

“收下……二月十八日，你得如数还我。”

马托尔奇觉得受到了侮辱，差一点把钱扔回去。可是，老妇人的眼泪马上使他忍了下来。

马托尔奇正要跨进马车，看见一位穿着整齐、相貌端庄的少女从大路上走来。他凭直觉知道她就是玛琪。虽然马托尔奇对玛琪一见钟情，但当他看到车夫和那被遗弃似地站在门廊里的狄柯尼太太，便决计走了。车子挪动了，玛姐和玛琪的目光一直盯在他的脖颈上，而那包金币却一直在扰乱着他的心，他从此是不是成了一个受女人赡养的男人了呢？他的精神完全垮了，昨天他空着肚子走在这条公路上时还蛮有勇气和精力，今天他虽已酒足饭饱，却已经成了一个毫不足道、毫无希望的废物。

路上，他从车夫嘴里了解到，他乘坐的这辆车子正是阿尔达伊男爵派车夫送一位小姐上火车站后转回来的。他早听说过阿尔达伊男爵每星期换一个新的情妇，这个小姐肯定是其中的一个了。车夫还告诉马托尔奇，他还得跑一趟火车站，送阿尔达伊男爵到城里去开教会会议，因为阿尔达伊是理事长，一定得出席。经他这一提，马托尔奇才想起自己也得参加这次会议；按道理，上任后他本该先去拜访阿尔达伊男爵的，可是就职典礼后发生的不愉快使他把这事儿忽略了。车子在教堂前面停下，他决心打开那个小包，从里面挑出一个最小的金币赏给车夫。

小学教员的胖太太站在学校围墙旁，马托尔奇装着没看见，以避免同她打招呼。这时候，他厌恶每一个人，又害怕这个世界。他为什么要接受这些该诅咒的钱？又为什么要把一枚金币赏给赶车的？他怎么能在二月十八日这一天归还这些钱呢？

次日，马托尔奇搭维洛夫妇的马车进城。他走进一家旅馆，舒心地叹了一口气。从此刻起到第二天下午，他是一个自由和独立的人了。一股情欲已经在他身上作祟了好久。它在昨天从他身上发作起来，先扫荡掉了狄柯尼太太，还催眠了她家里所有的姑娘：那个小玛姐、使女，还有玛琪。他知道，他的孤身独宿已经引起村子里许多女人的痴想。前几天，有一个农家小姑娘偷偷溜进教区公舍的大门，情愿委身给他。一想到可能有人会当场捉到他们，他的血就凝住在血管里了。就是刚才坐在马车上，维洛的妻子，一个骄傲的农妇还主动挑逗他呢，可是他害怕闹出丑闻，有损他的名誉和前途，一直在克制自己。现在不同了，在城里，就不用顾忌他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责任的约束了。现在他又变成一个渴望爱情的青年学生。马托尔奇在酒店雅座坐下，一个年轻的侍女走过来用放荡的娇媚声音问他需要什么时，尽管感到角落里有三个人用醉眼远远地盯住他，还是脱口说出：

“我要你。”

那姑娘嫣然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眼睛里充满了挑逗、引诱。他闭上

眼睛，恨不得跳起来，把她拉到一个完全隐蔽的最近便的密室。她挨近了些，轻轻地碰着他的胳膊，隔着一层薄薄的短衫，他看见她那美丽的线条，于是他全身的血液都涌到头上来。他叫姑娘给他开一个房间。她闭上眼睛，点头表示同意。马托尔奇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最大的金币递给她。他捏着她雪白柔软的小手，仿佛一股电流通过了他的全身。

就在侍女走去招待别的客人时，马托尔奇又为自己的情欲冲动感到不安。他想起自己曾经说过要当一个火炬，为别人燃烧自己，可是他做了什么事情呀？他不仅不知道应该怎样帮助他的教友，甚至连他们有些什么困难都不知道呢。不行，这不是一个做牧师应有的品德。他责备自己是一个无力引导人民走向光明的低能儿。侍女迈着懒洋洋的袅娜步子进来了，一股情欲又侵袭着他，他要侍女陪他上床。但酒店犹太老板却申斥侍女不得陪伴马托尔奇，打发她去陪别的贵客。他感到这是一种耻辱，过去几个月中闷在他那痛苦的心里的许多屈辱都在寻找一条宣泄的路，他决意同老板算账。这时，侍女急急忙忙进来告诉他说，她正在摆弄他送她的那枚金币时，爵爷和警察局长把它抢走了，还吩咐他去见他们。

一刻钟以前曾经震撼过他的躯体的情欲，现在已经让位给卑顺了。正如从前所曾碰到过的许多类似的情况，他又觉悟到自己真是一个毫无意志和毅力的懦夫。从另外一间雅座里出来一个人，粗鲁地把马托尔奇拉进那间餐室。餐室里的储蓄银行经理、警察局长和阿尔达伊男爵在津津有味地听一个青年在讲色情狂的故事。马托尔奇心想，一州里最著名的人物，却在这里如此这般地流连于酒色，真是一件丢脸的事。他已经听人家说过关于阿尔达伊的许多卑鄙行径，他简直不懂得为什么这样一个老浪子会当上人民领袖。他曾经变得憎恶农民，但是现在，他发现他对于这种缙绅阶级的厌恶却更为强烈。这种感情使他和底层人民联结在一个共同的仇恨中了。

“每年二月十八日，”阿尔达伊手里托着马托尔奇刚才送给侍女的那枚金币，用羊叫似的声音说，“我送一枚精选的金币给我的一个干女儿。”

马托尔奇顿时感到血管里的血凝住了，脸色煞白，仿佛被判处了死刑。二月十八日！阿尔达伊一定是玛妲的干爹了。难道他真是狄柯尼太太的第一个情夫？

警察局长逼马托尔奇又掏出一枚金币，阿尔达伊看了，立刻认出是他特意购来送给干女儿的。

“那个小姑娘今年十八岁。这些都是我送给她做嫁妆的。”

警察进来了，警察局长命令他们把马托尔奇带走。这时阿尔达伊制止了，口授警察局长写道：被告承认从狄柯尼太太那里获得这些金币，至于得到这些金币的详情，迄今尚未查明……

马托尔奇醒悟了，原来狄柯尼太太是阿尔达伊的姘头。

马托尔奇起先不肯签字，一看到三个警察的铁拳和有利的臂膀，便乖乖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警察局长还命令那几个警察作为证人也在上面签字，然后交给阿尔达伊。这时，马托尔奇终于明白了，这出戏是这伙流氓事先安排好让他掉进去的圈套。

马托尔奇愤愤地回到自己的客房，发现房里亮着一支蜡烛，旁边坐着鬼魂似的狄柯尼太太，不由得吓呆了。

狄柯尼太太从马托尔奇嘴里知道刚才发生的事，吓得目瞪口呆，过了好久，才低声地问：“他要这个口供做什么呢？”

接着，狄柯尼太太告诉他，她遭到了厄运，是来向他这位全能上帝的使者求助的，因为她面临最后的审判。马托尔奇的安慰使她有勇气把自己早年不满于单调的家庭生活，追求淫佚放浪，沉溺于私情的愉快的罪孽原原本本说出来：在她还是一个小姑娘时，便被人从父亲的灵床旁送到一个牧师家里去。这个牧师是个胖子，平庸而粗俗。在结婚的头一天晚上，她就像现在一样憎厌他了。那时她还没有成熟，小产了六胎。后来，在一次大选中，她同候选人阿尔达伊邂逅相遇，完全被他迷住了。他是个典型的匈牙利贵族出身的花花公子，不懂得劳动，只知命令别人做事，吮吸别人的血，一味寻欢作乐，仿佛世界是专为他独享而创造出来的。那时他已经有一个伯爵小姐太太了，可是她经受不住阿尔达伊的引诱，从丈夫家里跑掉，投入他的怀抱，跟他在捷克草原同居十四个月。后来他厌倦她，把她抛弃了。那时，她同他生的女儿才三个月，他将女儿夺走，逼她回到丈夫身边。从此以后，她成了狄柯尼的好妻子，可是她丈夫关心的只是种地、收获，而她的兴趣却跟他不同。十年来，她不同丈夫同住一间房，玛姐是狄柯尼同别的女人生的。她已多年没有见到亲生女儿。今天，女儿临死前叫人捎话要她去见一面。女儿已经结婚两年，丈夫先开枪打死她，然后自杀……

狄柯尼太太要求马托尔奇陪她去见阿尔达伊。阿尔达伊看见青年牧师在场，不免感到有点窘，但马上又装出一副很不在乎的样子。他问狄柯尼太太是不是她的女儿去请她的。他说，昨天他正跟一位年轻漂亮的职业舞蹈家在一起时，他们的女儿突然出现，要求他结束他的丑恶生活，同她的生母结婚，并说她要跟她丈夫离婚，因为她憎恨他，以前所以容忍，是为了父亲的原故。阿尔达伊一向从女婿的银行得到优惠的贷款，女儿离婚便意味着阿尔达伊在经济上的垮台。女儿还说，她从不爱她的丈夫，她正热恋着一个有妇之夫，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她不曾享受到母爱，因此宣称一定要见见母亲。阿尔达伊还说，他的道德观念跟女儿不同，希望狄柯尼太太最好写信告诉女儿，她的要求是办不到的……

狄柯尼太太冷冷地看着他，摇摇头表示不同意，阿尔达伊便威胁她说：那么，只好我自己告诉她了。

“原来这就是你要这位青年人口供的原因，”她突然愤怒地叫嚷起来，“你要拿那个东西向她证明我至今还有一个情夫。”

她站起来，轻蔑地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眼，气得转身就走。到了门口，又以一个自尊心受到伤害的人的悲哀，歇斯底里地嚷道：

“你这个恶棍！一钱不值的畜生……你的女儿已经死了……被枪杀了……到捷克草原去看吧……他们两个都死了，你的女儿和女婿。”

从城里回来后，马托尔奇害了一场病，病愈后，身体比以前更加瘦弱了。他正坐在书桌旁读一本教义演说集，并随手做些札记。母亲抱怨面粉和马铃薯质量太次，这使他感到有些对不起体衰的母亲。可是，自从他就职以来，只给五六个孩子洗过礼，给一个老妇人行过葬礼，此外没有人登门拜访过他。当然，教区理事维洛倒是每星期天早晨都来把捐献箱子拿走，等人们做完礼拜后送回来，可是里面只有几个铜币。

邮差送来玛姐写给他的信，邀请他和他的母亲星期三晚上到莫萨去参加她们在学校里举行的晚餐会，并说玛琪也在等候他，请他务必去。他想到世界上还有一个美貌、温顺的姑娘在惦念他，心里顿时觉得非常甜蜜。他把信的内容告诉母亲，母亲却坚决地说：

“我可不去。”

正在这时，阿尔达伊进来了，向年轻牧师表示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忏悔，把逼迫马托尔奇画押的供词和金币还给他。他说二月十八日快到了，希望马托尔奇把金币还给狄柯尼太太，并转告她，“那个快要进入坟墓的老头想要偿还他的宿债，补救他过去犯的罪孽……他打算遵从女儿的意愿，同她结婚……”

马托尔奇不仅大为感动，而且震惊了。于是他又劝母亲同他一起去拜访狄柯尼太太，母亲终于把忍了许久的话说出来。

“你不要到那里去，”母亲脸颊通红，竭力不让眼泪流出来，“那个老妇人爱上你了。啊，天呵，怎么要我告诉你这种丑事呢！”

马托尔奇安慰她说，刚才来的就是阿尔达伊，他已经答应同狄柯尼太太结婚。

“怎么，跟一个有夫之妇结婚？”她叫了起来，脸上露出迷惘不解的神情。

晚会是在学校里举行的。狄柯尼先生以一个农民式的亲热问候他。马托尔奇心里想，要是你知道我为你的妻子另找了一个丈夫，你就不会对我这样亲热了。马托尔奇很不喜欢狄柯尼牧师，因为他满嘴仁慈，干的却是剥削穷人的勾当，可是表面上又不得不同他敷衍几句。

马托尔奇看见狄柯尼太太以一个慈母似的神情看着他，使他改变了为阿尔达伊牵线的念头，担心这里面另有诡计。狄柯尼母女把他介绍给一些女客，她们大多是小地主的家小，对他很亲热。玛琪很快被一群青年邀请去跳舞了。不会跳舞的马托尔奇被一个脾气古怪的老太太缠住，好在狄柯尼太太及时过来搭救了他，还轻声对他说：“她是本城公证人的妻子，也是我丈夫的姘头之一。”玛琪终于来了，马托尔奇的心立即转移到她身上，可又不敢马上离开狄柯尼太太和那一群女客，何况还有阿尔达伊委托他的事和那包金币呢。马托尔奇注意到有位女客提到明天是二月十八日，也就是玛琪生日时，他的脸登时红到了耳根。狄柯尼太太恨不得抓住他的手安慰他，万一他丈夫查问起阿尔达伊历年送给玛琪的金币，她就把从银行里买来顶替的金币给他看。马托尔奇哑着声音说：

“原来的那些金币全在我的口袋里，一个也不少。”

他激动地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那些金币。狄柯尼太太想到他会当众把金币递给她，急得几乎晕倒。果然不出她所料，他卤莽地把那包金币递给她。她急中生智，以一种自己都觉得奇怪的声音说：

“这是糖吗？……送给玛琪的？你想得真周到。”她故意玩弄那个纸包，看样子稍不留心，纸包就会散开来。

这紧张的情绪使他很痛苦，就靠着狄柯尼太太的椅子，轻声对她说：

“前天阿尔达伊来找我，要我告诉你，他要依从他女儿的请求了。”

说完，他转身离开，去找玛琪。玛琪正在一个书橱旁找书。他们谈得很投机，他欣赏着这一朵命运飘落在他的路上的鲜花，他陶醉了。天亮了，玛琪靠在一根木柱子上，打着寒颤。他看着自己身上那件皱皱巴巴的大衣，他怎么能把她裹在这件大衣里送她回去呢？他觉得很丢脸。如果一个人不能对他崇拜的对象尽责，就不配崇拜一个美人。他需要有钱，他得过好日子。他说：“主呵，我信仰你……我看到了幸福的生活。我把幸福献给大家，自己也将得到幸福。我将要给她充当一个火炬。”



玛琪为马托尔奇的热烈追求所感动，把学校当局如何克扣她的薪水的无耻行为一五一十告诉他。马托尔奇不觉暗暗责备自己，过去想的只是自己，竟没有真正想到过关心这位自己热恋着的美人的疾苦。他想到狄柯尼是莫萨的校务委员会主席，他不该容忍校长如此欺侮和剥削这位纤弱的姑娘。于是，他决定去找狄柯尼先生评理。狄柯尼一见到他，张口就问：

“感谢上帝，我地里收成很好。你的怎么样？”

听到这些话，使马托尔奇突然改变主意，不再提玛琪的事，接过话茬说：

“这正是我要来跟你商量的。”

接着，他告诉狄柯尼，他的前任把薪俸折成现金，不收实物，可是现在货币贬值，弄得他简直入不敷出，表示要将此事在下星期天召开的长老会议上提出来，要求恢复契约上原来的条件，改收实物。

狄柯尼先生劝他不要这样做，以免招来农民的报复，并主动提出愿意付较高的租金把他份下的地租过来。一年来的挫折使马托尔奇变得精明了，差不多成了一个铁石心肠的商人，连这点便宜他也不会让人占去，没有答应狄柯尼的要求。

他怀着满意的心情，走进树林去找玛琪，这时才想起竟没有向狄柯尼提起玛琪的事。可是他对于这个疏忽并不懊悔。他竭力说服自己，不要把卑鄙龌龊的生意经同玛琪的名字连在一起。她应当被当作一朵娇艳的鲜花，而不是一位被克扣薪水的乡村小学女教师。

他为自己懂得生财之道颇为得意，像是真正发现自己的本性似的，泰然自若地准备把理论付诸行动。他觉得自己突然懂得如何游泳了，准备迎着人生的浪头，努力拍打着水面。

马托尔奇对人生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再无需像从前那样聚精会神花上一个星期时间去准备他的布道词。对过去欺骗他、剥削他的人，他报复起来是毫不手软的。他直截了当告诉维洛，他准备在长老会上提出要把教堂的土地加租。开头，维洛口气还很硬，后来只好同意他的条件。总之，为了要同玛琪结婚，他需要钱，至于手段他就不顾了。他甚至想到同阿尔达伊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农民。他去请求阿尔达伊帮助重建快要倒塌的小学校，这样教区里的人就会把他这个年轻牧师看作本村的守护天使。阿尔达伊也可以花一点点小钱来做村子里的恩人。这个想法正中阿尔达伊的下怀，羊毛出在羊身上，阿尔达伊提出开舞会募集重建校舍的款子。

舞厅是临时由一个旧谷仓改装成的，容纳得下从本州各地来赶热闹、寻欢作乐的人跳舞。看着一对对男女在翩翩起舞，马托尔奇想到他最近的态度和决策；为了自己的利益，以不公正的手段去利用别人，深感扞心有愧，但如果等着饿死，尤其是他要同一位天使结婚急着等钱用时，这样做也是无可指摘的。他感到宽心的是，自从他采取谋私利的手段后，人们反而对他恭敬起来，维洛开始畏惧他，维洛的妻子还不断送东西来给他母亲。阿尔达伊对他也判若两人，答应给他一块新校舍地基，还送来许多礼物，当然这些也不是无代价的。阿尔达伊末了催促马托尔奇去说服狄柯尼太太来参加今晚的舞会。马托尔奇心里明白，他已经把阿尔达伊引为精神上的同道者，希望阿尔达伊推荐他到城里去当牧师，这同他刚上任时所怀有的公正无私，不谋求私利的抱负是背道而驰的。可是他堕落了，灵魂却怂恿他：只要我能把我那娇小的玛琪从卑贱的乡村生活中拯救出来，离开这些爱吵架、肮脏的农民，那就行了。将来我们生活在绅士伯爵圈子里，生活会是另一种样子。

马托尔奇的目光终于落在阿尔达伊身上，见他正坐在狄柯尼太太身旁。他仔细观察他们的神色，看出他们都显出一副和睦的模样，不禁为自己的努力有了结果感到满意。他十分肯定，只要狄柯尼太太变成阿尔达伊太太，他就能得到她全力的支持。他心里清楚，这种希望是不道德的，不觉脸上火辣辣的。

这时，他发现阿尔达伊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正神情严峻地望着他，这是不祥的征候。狄柯尼太太也站起身，走到站在入口处的女人堆里去，显出厌倦的神态。阿尔达伊答应过在舞会上当众把新校址的捐赠证书交给他。他正得意地环顾四周，阿尔达伊从他身边走过，他急忙向阿尔达伊恭敬而又有点亲热地鞠了一躬。

阿尔达伊略站片刻，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淡口吻对他说：

“对不起，眼下我没有工夫跟你聊天。在舞会上，大家应该让我安静些才好。”说完，像希腊主神宙斯，神气活现地走开了。

这一出乎意外的打击，使马托尔奇感到手足无措，他踉踉跄跄跑到井旁要了一口水喝。他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神经质地反反复复说：

“如果我还要这样卑躬屈节下去，非要有一张厚厚的脸皮不可。这都是我离开上帝指点的道路的缘故。然而我要活，这算得上是罪恶吗？我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自尊心，变成魔鬼的奴仆，我配不上享受全能上帝创造的那个天真可爱的创造物的爱情……这不是我的过错呀！过错在于那些我们把他们称之为‘人’的邪恶畜生，他们从不考虑他们的同胞，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同归于尽呢？地球应该立即停止转动，这样，人人都要死去。我希望做一个使全世界燃烧起来的火炬，让人们在火海里死光。”

霎时间，他看见天空中出现一片他幻想的大火，火趁风势，火舌狂喜似地舔食着谷仓屋顶，从那熔炉似的仓房传出阵阵悲惨的叫喊声。马托尔奇惊呆了，定了定神后便向火场走去。四周响起哭声、叫喊声、诅咒声和祈祷声，从火堆里散发出人体被烧焦的臭味。面对这可怕的灾难，他暗暗自我谴责：

“你的理想是火炬……是你想要人们遭受这场厄运。杀人犯……疯狂的罪犯！”

他绝望地捶打着自己的太阳穴。玛琪从背后张皇失措的喊声把他惊醒过来，她扑到他的怀里，于是他们就在半昏迷状态中第一次拥抱、接吻。

原来这场大火是一枝蜡烛烧着舞厅里扎的彩花引起的。开始人们以为是誰在开玩笑，等到火势发展到不可收拾时，大家才慌乱地奔向门口。为了不让那些没有购入场券的人入内，大门早已闭上了，一时打不开，就这样活活烧死了二百八十多人，受伤者不计其数。马托尔奇感到良心上受到谴责，一直呆在现场负责抢救和安置死难者的工作。他一回到家就病倒了，昏迷了三天三夜。

狄柯尼太太和玛琪等人前来看望他。他知道自己过不了今天夜里。生命已经离开他的躯体，难道他没有达到目的就这样死掉吗？

“玛……琪，”他的声音很响，使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

他要玛琪从抽屉里找出一个盒子。

“戒指……”马托尔奇又说了一声，像是对她的行动缓慢表示不满。

玛琪吃惊地打开盒盖，里面有一对戒指并排放在锦缎上，原来是一对订婚戒指。马托尔奇立刻把一只戒指套在玛琪手指上，动作快得叫人吃惊。可

是，他的力气已经用尽，不能给自己戴另一只戒指了。

他终于吃力地套上戒指，闭上眼睛，叹息一声说：

“你会……为这事……生我的……气吗？”

回答他的是一阵大声的哭泣。

他拿过玛琪的手亲了亲，翻身对着墙壁睡着了。

半个钟头后，马托尔奇又睁开眼睛。这时只有狄柯尼太太在他身旁，他望着她，微微一笑，要她到阿尔达伊那儿去。

“如果你爱他，就应该到他那儿去。”

“爱……爱，”她直爽地说，“他为什么现在才来爱我？因为他女儿在遗嘱里说，如果他跟我结婚，捷克草原上的产业就归他……因此他才爱……”

这使谈话变得非常痛苦。

马托尔奇不停地咳嗽，疲惫地想：一切都安顿好了，玛琪成了他的未婚妻，一辈子受誓言的约束，……还以为他是一个好人。

快到午夜时，坐在他床边朦胧睡去的玛琪突然感到有人握着她的手，就醒过来了。

“你会不会把我当作一个纯洁、善良、忠诚的小丈夫，永远记着我？”

玛琪以一阵呜咽作为回答。

“如果你……更深地了解我，你会知道我是个恶人。”

“不，亲爱的，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不，……不是……”他固执地摇摇头。“我不是好人；我是火炬……杀害了他们。”

突然，马托尔奇从床上跳下来，伸开双臂，说着呓语；他仿佛看到左右两旁站着两位使徒。他疲惫地悲泣着：

“主呵，你给了我们爱。但却是海市蜃楼，……而不是生命。”

他把僵直的手指高高地指向天空，以一个超于他的气力的声音大叫：

“人呵，遵从永恒的大自然规律吧……”

当她们把他扶到床上躺下时，他已经处于弥留的最后时刻。

事情是结束了，但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

通过以上简介可以看出，作者在《火炬》里着力描写的主人公马托尔奇，作为生活在半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形象，是有一定代表性的。这类知识分子大多数出身低微，政治嗅觉却比较敏锐，早就看出匈牙利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下过决心要改变不合理现实。可是他们身上又都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他们自命不凡，摆出一副救世主的姿态，瞧不起群众的力量；但是，他们在经济上仍然摆脱不了对上层统治阶级的依附。因此，他们都是些口头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永远陷于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群众的矛盾冲突之中而不能自拔。马托尔奇的典型意义也正在于此。他本是品学兼优的好青年，怀着“为全人类的文化与正义而工作”的热忱，走上工作岗位，不料第三天即被村里的实权派榨取了半年的薪俸。饥饿使他失去了斗志，不能忠于原来的理想。生活上的贪图安逸和性格上的懦弱，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给人民指明方向的火炬。相反，他很快变成了只关心个人利益和幸福的庸人。他不愿意了解和接触真正的劳动农民，疏远他们。为了攒钱娶他心爱的姑娘，他对农民的苛刻榨取，不亚于他原先痛恨的狄柯尼牧师。掌握全村人命运的贵族地主柯尔达伊是个道德败坏、生活糜烂的老浪子。马托尔奇对他是深恶痛绝的，但是为了个人的升迁和组织一个美满家庭，过舒适、幸福的生活，他竟背叛

自己的誓言，屈从于柯尔达伊等人代表的恶势力。马托尔奇身上表现出来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可以说是半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的通病。

然而，马托尔奇毕竟跟封建势力的代表柯尔达伊等人有所不同。火灾发生后，他终于有所觉悟，意识到由于自己同统治阶级的妥协，对村里发生的那场悲惨事件也应负有责任。他深感内疚，进行自我谴责，却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最后只得在自我折磨中痛苦死去。

《火炬》的作者采取现实主义手法，细致、深刻地描写了马托尔奇怎样和在什么环境下逐步摒弃最初的远大理想和高尚情操。围绕他的命运，展现出村里的农民、知识分子、贵族地主及其代理人的活动和主要特征。通过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勾勒出二十世纪初匈牙利农村的面貌。更重要的是，莫里兹经由马托尔奇的嘴咒骂“老浪子当人民领袖”，对整个上层统治阶级发出了最猛烈的抨击，指出他们是造成人民愚昧、落后，社会贫困的真正祸首。因此，《火炬》实质上预示着，统治危机在匈牙利已经出现，一场暴风雨般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说明作者在思想上已经同那个落后的半封建社会彻底决裂，做好充分准备迎接那 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火炬》最后以“事件是结束了，但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作为结束语，这是意味深长的。一场大火象征着腐朽的匈牙利封建制度必将烧成灰烬，但谁是未来的革命力量呢？关于这个问题，莫里兹还没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 《亲戚》

《亲戚》是一部具有强烈批判性的社会问题小说，主要情节如下：

妻子莉娜在隔壁房间打电话的声音把彼斯托吵醒了。莉娜正向女友询问浇在烤兔子肉上头的汁是怎么做的，那是彼斯托最喜欢吃的菜。她的声音是那样甜蜜、那样自信、那样幸福，他已经许久没有听到她用这种声音说话了。他的眼眶里闪动着泪花。

昨天上午举行的市参议会上，一个非常偶然的的机会，彼斯托当选为约拉特诺克城的检察长。晚上，市政机关头面人物以及彼斯托的朋友们为他举行一个庆祝晚宴，第二天清晨大家才尽兴而散。彼斯托一到家便倒头大睡，醒来时已经快十点钟了。他伸了伸懒腰，舒适地躺在床上，一点也没有想要起床的意思。在这之前，他这位人微职卑的小小文化参事，每天都得早早起来赶去上班。如今不同了，现在他用不着急着走，也不用去为他当文化参事时制定的那些到头来一个也兑现不了的诸如扫盲、增修校舍等计划而操劳奔波了。现在他已经成了让人家等候他的人物。

莉娜轻轻推开卧室的门，笑吟吟地走进来，主动向他表示亲热。要是昨天他这个时候还睡懒觉，莉娜一定会白着脸进来，冲他咆哮。可是，她今天不知发生了什么变化，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十岁。

原副检察长麦克罗茨要当这届检察长是意料中的事，可是他太盛气凌人，说漏了嘴，引起众怒。市长和银行经理担心自己也被牵连进去，中途把麦克罗茨甩掉，换上各派都能接受的彼斯托。彼斯托出身破落的小贵族家庭，幼年丧父，过着清贫的日子，有正义感，同情穷苦人民。十多年的文化参事工作，使他有幸亲眼看到农民的贫穷和受到的奴役，暗自下决心要为劳苦大众谋福利。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想一扫市政机构的贪污腐化，为民办点好事。他正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抱负，莉娜突如其来地追问他晚宴上花

了多少钱，得知他把二十个庞克全花了，大吃一惊，那几乎是他们半个月的家用呢。莉娜硬要他报细账，到底吃了些什么东西。彼斯托在宴会上听到乐队演奏一个曲子，使他想起过去的恋人玛克托连娜，慷慨地给了乐师十个庞克小费。莉娜勃然大怒。

现在彼斯托对妻子管得那么严感到很不快，他是一个男子汉，随着地位的变化，花钱也应该大方些。对妻子的不满，引起他对多年没有见面的玛克托连娜的想念。

莉娜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十多年来跟着收入微薄的丈夫过着平静、俭朴但幸福的小康生活。她善于料理家务，量入为山，体贴丈夫，精心抚养两个孩子，是一位贤妻良母。现在，她开始感到某种担心，也为失去过去美好而平静的生活惋惜。丈夫高升了，她还能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会不会离开她，离开她的俭朴的世界？

彼斯托走进餐室，那里已经有许多邮件在等候着他。全是向他祝贺的信件，说的大都是些恭维话，有些人还顺便求他给谋个职位。

来信中有一封是彼斯托最小的舅舅拉约什写的。他最喜欢这个舅舅，十多年没有同这个舅舅见面了。人穷亲戚少，富亲戚不屑与你来往，穷亲戚又不能从你那里得到好处。现在彼斯托升官了，各式各样的亲戚都从四面八方冒出来。拉约什在信中诉说农村生活的艰辛，请求外甥给他一件穿得出去的衣服，他好亲自进城来道喜，末了还托外甥为他的儿子在音乐学校谋个职位。莉娜勉强答应给拉约什舅舅捎一套彼斯托已经不能穿的旧礼服。

彼斯托上任的第一天，一跨出大门的第一个想法是趁早搬家。他现在的住宅十分窄小，没有下水道，臭水横流，同他现在的身分极不相称。他边走边盘算如何买一套三房一厅的房子。突然听到有一个咋咋呼呼的声音冲他叫喊：

“你好哇，你好哇，亲爱的！”

彼斯托站定一看，原来是掌握本城财政命脉的储蓄银行总经理科勒迪茨。此人过去同他只有点头之交，现在竟屈尊先同他打招呼，亲热地责怪彼斯托从不去看望他这个表姐夫。彼斯托当然知道，科勒迪茨的妻子是他的远房表姐。她的外祖父私吞了彼斯托父亲该继承的一批产业，造成他们一家的穷困。科勒迪茨再三邀请彼斯托以后每逢星期四都到他家参加晚餐会。

彼斯托来到市政厅，凡是见到他的人都抢先向他致意，大门的警卫也向他敬礼，这是十六年来他进进出出市政厅大门第一次享受到的荣誉。他还没有走到自己的办公室，市长秘书在半道笑容满面迎上来对他说：市长有请。

市长是位保养得很好的小个子老头，其貌不扬，其言不通，却精于统治艺术，坐了三十八年的市长交椅，是全国当市长时间最长的罕见人物。他对彼斯托非常亲切，得知科勒迪茨是彼斯托的表姐夫后，要彼斯托今后叫他贝拉大叔。彼斯托受宠若惊，刚才的局促不安顿时消失，但仍小心谨慎地向市长建议，市政府某些部门需要改组，把美国贷款用在有收益的公用事业投资上，建立市政府企业等等。彼斯托发现市长不住地点头。为了讨好市长，便违心地提到养猪场，其实他十分明白，惟有这个养猪场是一个子儿也不许扔进去的地方，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他早听说养猪场是市掌权人物借以侵吞公款，进行贪污的场所。正是养猪场的经理勃龙柯伊，即玛克托连娜的丈夫盗走了养猪场的基本投资，为自己建造了一幢豪华的别墅，养猪场才面临破产。彼斯托深知一万多户佃农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现在作为市检察长，不得不

维护本城的利益，正确对佃农问题抱先听市长指示的态度。无奈他在市长紧盯下，脱口提出“既要叫山羊吃饱，又不要让白菜全给吃了”的兼顾利益办法，深受市长赞赏。彼斯托得意之余，提出要鼓励纳税这一风马牛不相及的建议。同市长的谈话作为新检察长的工作计划见报了。反应不一，有称赞的，也有嘲笑的。

第二天，科勒迪茨差职员来见彼斯托，要他在一个文件上签字。那是关系到银行同市森林管理局之间的一场官司，银行明显违法，连前任都不敢管，因此彼斯托以不了解情况为由，拒绝签字。可是市长马上召见他，拐弯抹角要他签字，满足银行的要求。

市长还提醒彼斯托，务必要出席科勒迪茨家的星期四聚餐会，原因是每星期五市议会开会，主要议案都在聚餐会上由有关人士事先商量决定。彼斯托明白那是关系到自己前程的大事，回家劝说莉娜同往。这时内政部确认彼斯托任职的公文终于下达了，彼斯托夫妇才除去一块心病，只等去首都拜会内政部长的通知。莉娜从而打消了原先担心受到女主人怠慢的顾虑。她看出那些人都在拉拢她的丈夫，拉关系最好的途径莫过于通过妻子。如果他们想同她的丈夫结成同盟，先得把她当同盟者的同盟对待，有谁能比检察长的妻子更能使检察长晕头转向呢？她于是欣然同意去参加聚餐会，请女裁缝赶做礼服。

就在这个时候，彼斯托的另一个舅舅贝尔奇找上门来了。贝尔奇舅舅是个潦倒的乡村律师，穷极无聊，到处招摇撞骗。他也多年没有同不可能接济他的外甥来往了。这次得知外甥交好运，专程前来祝贺，佯称他新买了一个上好的煤矿，还带来一块煤样品，要彼斯托出面为他打通关节，让市政府购买他的煤供城市取暖。彼斯托深知贝尔奇舅舅的底细，以不主管经济为名，婉言拒绝。但是，彼斯托的家族精神，不允许他拒亲戚于千里之外，不依靠自家人靠谁呢？何况贝尔奇舅舅主动提出事成之后，给彼斯托百分之二十的提成，还说那是正当的收入，总数可达两万庞克，彼斯托心动了。贝尔奇舅舅临走前背着莉娜向彼斯托要二十个庞克做路费。可是彼斯托身上连半个庞克也没有，他知道莉娜很厌恶这个舅舅，不敢开口向她要钱，只好让舅舅空着手回去。这样对待亲戚，是同彼斯托从母亲那里所受到的教育不相容的，使他更感到一个男子汉身无分文的痛苦。

贝尔奇舅舅的到来使莉娜很不安。她很敏感，丈夫刚升官，穷亲戚便接踵而来，担心丈夫上这些亲戚的当。因此，借口衣服做得不合适和孩子生病，同丈夫闹了点小别扭，但在彼斯托半强迫半劝说下，他俩还是到科勒迪茨寓所参加晚餐会去了。科勒迪茨的寓所十分豪华，晚宴极其排场，佳肴美酒自不必言，每位客人身后都站立着一名很精神的年轻人伺候。全城的权贵、名流，连主教大人都出席了。

晚宴快结束时，科勒迪茨把彼斯托叫到一旁，对他说：

“城外林荫区有栋漂亮的别墅，你得把它买下。”

彼斯托不禁笑了起来，因为这使 he 想起口袋里有数的几个钱；尽管他有过搬家的念头，但买一幢别墅，他连做梦也没有想过。

科勒迪茨关切地告诉他，那幢别墅的主人急于出手，售价极低。再说，彼斯托现在地位变了，应该有自己的房子，何况现在买比一年后买有利。现在可以放风说，是用继承下来的遗产买的，免得日后别人说闲话。他还答应作为亲戚，银行可以给他开户头贷款。彼斯托又动心了。

莉娜对在晚宴上受到应有的招待非常满意。彼斯托看到自己的妻子在那群贵夫人中显得风度十分高雅，是她们中最漂亮的一个，感到无比自豪的同时，觉得十多年来委屈了美貌的娇妻，决心要让她结束灰姑娘的生活。晚宴后回家，夫妇俩各怀心事上了床。彼斯托很羡慕那些富人：这些有钱人过得可真好啊！他想赶快发财，巩固自己的地位，也许还要做本城的市长呢。莉娜却发愁自己简陋的小屋如何接待科勒迪茨的回访。他们十年来安宁、幸福的家庭生活被打乱了。

彼斯托已经把市长看作自己的亲大叔，将科勒迪茨建议他买别墅的事告诉市长。市长要他放心，说凡是科勒迪茨建议的，连瞎子也会接受，并透露科勒迪茨对他有好感。彼斯托像吃了一颗定心丸，认定自己已经是这个城市特殊人物圈子里头的一员了。他顿时精神抖擞，昂首阔步回到家里，更感到现在的住宅太小太寒碜，要得到新居的欲望更强烈了。

在家里，彼斯托又看到妹妹的来信。妹妹诉说丈夫是个不可救药的人，失业两年，本性难移，还同不三不四的女人鬼混，五个孩子全靠她一人养活，经常挨饿。彼斯托最疼爱这个小妹妹，母亲在世时全家人都把她当宝贝。后来她不顾家人的劝阻，同一个有妻子的没落贵族子弟结婚，加上姑嫂不和，小妹妹也十多年没有同彼斯托通信了。小妹妹和她的孩子们在挨饿，想起故去的寡母，使他良心上受到严厉的谴责。他决定把当检察长后签署的第一个文件所得五十庞克外快邮给小妹妹。莉娜大发雷霆，又哭又闹，责备彼斯托把所有的亲戚都弄来，骂他们是寄生在彼斯托身上的臭虫卵。彼斯托受不了这种辱骂，同莉娜争吵，一气之下，从家里走出去了。

他眼眶里闪动着泪花，拼命往城郊奔跑。他很爱弟弟妹妹，从不认为弟弟妹妹的天资不如他就应该比他少点权利；即使是这样，那个较强的不应该帮助一母所生的弱者和差者吗？他开始对莉娜产生反感，她能成为他飞黄腾达后的伴侣吗？她只会成为他官场生涯中的一个累赘。他需要的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内助，不是一个能干粗活的女人。

他在这个城市里居住多年，因职位卑微，交往的只有几家同他地位差不多的小地主和兽医。现在不同了，当一个人有了权势后，是需要有同盟者和帮手的。他很自然地想起他的弟弟梅涅赫尔。有一次，莉娜按梅涅赫尔的主意在做一笔生意上赔了本，从此恨死梅涅赫尔，发誓永世不再见到他。梅涅赫尔是布达佩斯国立民族博物馆考古部的专家，有真才实学。彼斯托要设法把他弄到本城来当博物馆馆长。梅涅赫尔精明能干，富有幻想，是他的知音，只要他们弟兄俩携起手来，必能在这个城里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

彼斯托不知不觉走到远离市中心的别墅区林荫道上。这里的房屋别具一格，它会使人产生许多遐想。他早想来见识见识这个新住宅区，索性放慢脚步，寻找科勒迪茨向他推荐的到底是哪一幢别墅。

猛然间，玛克托连娜漂亮的身影和华丽别致的衣著映入他的眼帘。彼斯托的呼吸几乎停止了，这就是他既想见又害怕见到的女人！他失去自控的能力，机械地跟在她后面走。玛克托连娜在一家门前站下，按了按门铃，就在这个时候，彼斯托追上了她，不自然地举举帽子向她打招呼。她微微点头一笑，飘然走进大门。彼斯托呆站在门外出神。

彼斯托闷闷不乐，走进俱乐部，与一位原是地主的退休少校不期而遇。由于经济危机，农产品价格下跌，少校只好卖掉原来经营的农庄，过着替年轻人当爱情顾问这种无聊的日子。彼斯托不免为这位心地善良的人失去最后

一点财产，天天在俱乐部消磨时光感到痛心。少校突然向他这个即将成为一幢别墅的新主人的幸运儿道贺。彼斯托大吃一惊，怎么科勒迪茨要他买别墅的事已经传开了？彼斯托心慌意乱，匆忙跑回办公室，向秘书彼得尔菲博士了解养猪场的背景。原来那幢别墅正是玛克托连娜的，是她的丈夫、养猪场经理勃龙柯伊利用职权，挪用养猪场资金建造的一幢豪华别墅。勃龙柯伊和玛克托连娜虽是夫妻，但并不相爱，各有外遇。科勒迪茨是玛克托连娜的情夫，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用别墅讨好玛克托连娜。养猪场亏空了，钱却跑进市长、科勒迪茨、勃龙柯伊以及同他们沾亲带故的地主贵族腰包里。养猪场的贪污案传开后，市长他们决意打发勃龙柯伊到农业部当秘书，设法卖掉别墅，以掩人耳目。经过策划，他们选中了彼斯托，想用半卖半送的别墅堵住检察长的嘴。彼斯托固有的弱点促使他也想半推半就地接受这个馈赠。彼斯托十分害怕自己被卷进去，这时他又感到还是莉娜为他安排的那个虽然是租来的、简陋的栖身之所安全和温暖，因此，急着回家同莉娜言归于好。他在厨房找到莉娜，经过一番温存，莉娜终于破涕为笑，并告诉他家里又来了亲戚。

亲戚，又是亲戚，彼斯托不免感到惊讶，怀着一种不妙的预感走进房间，一眼看见柯蒂姨妈正坐在沙发上等候他。这又是一位许多年没见面的亲戚。柯蒂姨妈开门见山，说明来意：

“我可从来没有不帮助自己亲戚的……正因为这样我才上你们这里来，……我知道，你们现在需要帮手，你们得有人料理一所大房子……”

彼斯托十分诧异，买房子的事他还没有答应下来，连外地的柯蒂姨妈都知道了。柯蒂姨妈对彼斯托赞不绝口，说柯普亚斯家族出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要是彼斯托可怜的母亲能活到今天该有多好。她告诉彼斯托，他的父亲曾苦恋着一位贵妇人，到头来连她的小拇指也没亲到过，却破坏了家庭的和睦，使他的母亲痛苦一辈子。这些话触动了彼斯托心上的最痛处，原来他现在同玛克托连娜的关系也同他父亲当年同那个贵妇人的关系一样，他气得几乎想把柯蒂姨妈撵走。

在秘书彼得尔菲博士的帮助下，彼斯托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着手研究养猪场的问题。他要彻底弄清楚养猪场这一典型贪污案的肮脏内幕，是不容易的。养猪场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出现，实权却掌握在大地主兼大商人老申特卡诺伊（玛克托连娜的父亲）手里，而他的女婿勃龙柯伊是经理。更重要的是，他们同州、市的大官，诸如副州长、市长和本城的财神爷科勒迪茨紧紧勾结在一起，高价收购他们自己的粮食和猪仔，私造账目，弄虚作假，做得天衣无缝，老百姓知道其中有鬼，在法律上却抓不到他们的把柄。

一天，市长通知彼斯托乘晚班车上布达佩斯拜会部长，再三嘱咐，要他相机行事，使部长确信本市有获得巨额贷款的必要，同行的还有副州长。

彼斯托一到首都就先去找弟弟梅涅赫尔，把自己的想法和苦恼全告诉他。梅涅赫尔鼓励他放手干，答应争取调到约拉特诺克去当博物馆馆长，以助兄长一臂之力。

在返回途中，彼斯托流露出希望为弟弟谋取博物馆馆长职位的意思，副州长答应把原先许诺给下台副检察长小舅子的馆长职位让给他弟弟。还告诉彼斯托，市长很器重他，对他的工作很满意。下火车后，副州长还吩咐自己的司机把彼斯托送回家。

彼斯托兴奋地把佩斯之行告诉莉娜，最后还说 除了梅涅赫尔，他没有去



看望其他的弟妹。他还听说阿勒贝尔弟弟在银行交易所担任高级助理员，并夸口说他们兄弟都是好样儿的。莉娜马上挖苦他说，正是那个好样儿的阿勒贝尔，刚来信要求替他在本城银行谋一个职位。彼斯托虽感到有点意外，又觉得帮助弟妹和亲戚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何况要是能在本城银行安插自己一个耳目也是好的，便决定找个机会向科勒迪茨提出来。

彼斯托正向市长汇报见部长的经过，科勒迪茨不经通报就闯进市长办公室，当着他的面传播部长的风流韵事，甚至商谈安插亲信、搞交易等事都没有回避他。最后，科勒迪茨硬拽着彼斯托去看房子。科勒迪茨对勃龙柯伊的别墅十分熟悉，像回到自己家一样把他从后门领进客厅。玛克托连娜和她的母亲已经等在那里。玛克托连娜显得格外可爱，她很高，走起路来身体挺得笔直，她的姿态像一位惯于保护自己，善于对人发号施令的女人。彼斯托觉得同没有社交经验、羞涩的莉娜相比，这个女人非常撩人……

玛克托连娜陪同彼斯托大致地看了别墅的陈设和花园后，科勒迪茨冷不防向彼斯托提出签订一份临时契约。起先，彼斯托有点犹豫，推说等妻子来看过以后再行定夺。科勒迪茨不容分说掏出笔来动手书写契约。末了，彼斯托作为买方，玛克托连娜作为卖方，科勒迪茨作为中间人，在契约上签了字。契约上房价低得使彼斯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且分文不花，完全由银行代为垫付。科勒迪茨等签字的墨迹一干，便把文件叠好揣进自己的皮夹子里，对彼斯托说：

“明天或后天你到储蓄银行来一趟，咱们一起把这事办啰。”

离开的时候，彼斯托几乎不敢环顾四周，他的举止像个小偷。不敢查看一下偷来的财物，只觉得凡是拿到手的东西都是好的……

回到家里，彼斯托发现莉娜正在厨房责骂那个不会于家务活的使女，无法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告诉她。他觉得自己干的是一番大事业，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商量的人，不禁又思念起梅涅赫尔来。他认为这份礼物太重了，但又觉得必须牢牢地抓住这个好机会不放。他心乱如麻，头晕眼花，不知道该怎么办，明天又将会怎么样……他忍不住了，把莉娜叫进来，把买别墅的事从头到尾一五一十告诉她。

莉娜伸出一只手，向他要契约。

彼斯托愣住了，告诉她契约在科勒迪茨手里，他要自己先到银行去办理手续。

莉娜认为这等于没有契约。彼斯托觉得妻子的话有点道理，但他怎么好意思向科勒迪茨伸手要那份契约呢？！事实上那是一份赠与书，只有在赠送者合意的时候才会交给你。他明白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科勒迪茨了。

彼斯托又想起前些天他交待经济参事关照贝尔奇舅舅卖煤的事，如若事情办妥，他可以用所得的钱来购买，不必靠科勒迪茨赠与。他又想到养猪场，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有找到任何贪污的痕迹。他突然觉得，自己像一只被蜘蛛网缠住的苍蝇……他会不会变成被蜘蛛吸干血的苍蝇，或者他自己也变成一只蜘蛛，去吮吸别的小动物的血？他仿佛站在十字路口。

他在俱乐部遇到反对派头头马迪尼博士。马迪尼博士向他谈到行政当局如何不关心人民的死活，一味追逐个人私利时，彼斯托听起来已不那么顺耳了。为人民的利益着想，设法改善人民的贫困处境，这曾经是他的理想，甚至也为之奋斗过，然而随着地位的变化，想法也变了。他想用相对干净的方法来获得权益的同时，兼顾民众的利益。可是正是这位口口声声代表人民呼

声的反对派头头，末了要求彼斯托帮助他买下正要贱卖的别墅，条件是他为彼斯托提供当权者们贪污行贿的一些材料。当马迪尼得知彼斯托与科勒迪茨和玛克托连哪有亲戚关系，已抢先一步买下别墅后，懊恼之余，同彼斯托攀了个拐了几个弯的亲戚关系，以图放弃反对派立场，到市政机构去当官。

莉娜劝丈夫凡事要三思而行，提醒他自从他升迁以后，以前从未走动的五花八门的亲戚全来巴结他了，他没有能力把这些穷亲戚都包下来。她向他摆了买别墅的利弊，劝他不要不自量力。她还指出，为了弄钱，他最后只能跟那些靠手中的权力克扣和盘剥穷人、贪污公款的人同流合污，陷进狼群里。对莉娜的话，从理智和感情上彼斯托都无法反驳。可是，经过痛苦的深思，他还是无法抗拒现实生活的引诱。

他要设法弄清楚科勒迪茨在养猪场的贪污案中陷得有多深，这样他就可以反过来左右他们，提出自己的条件。现在市长他们要把勃龙柯伊一家甩了，把那些对他们已无用的人踢开。他彼斯托也得这样，保住亲戚中那些有出息的，那些没有出息的只好凭他们去听天由命了，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但他又不忍心抛弃自己的弟妹，连那个最没出息，威胁说先杀死妻儿，然后再自杀的阿勒贝尔弟弟，也要设法安排他一个工作，让他混碗饭吃。

彼斯托想，科勒迪茨肯定有求于他才同他攀亲戚，替他垫钱购买房子，然后要他服服贴贴听命于他们。他彼斯托呢，得找到他们的把柄，再驾御他们。眼下他还没有完全陷进去，他还一个子儿也没有用过他们的呢。

第二天，他要负责建造养猪场的总工程师和经济参事陪他去视察那座养猪场，发现那里的建筑、设备都是第一流的，可就是里面没有猪。通过了解，对养猪场的内幕才有了眉目：由于主事人贪大求全，经营不善，加上农业经济危机的冲击，养猪场正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基金全流进权贵们的腰包，吃亏的是市政府和中小地主股东。

科勒迪茨一听说彼斯托亲自去养猪场察看，马上捎来急函，要他立刻到银行去。科勒迪茨向彼斯托侈谈养猪场的前途和收益后，给他在银行开了一个可以支配一万五千庞克的户头。彼斯托一个失去清白的女人那样，离开科勒迪茨的办公室，陷入一种旧我和新我的矛盾冲突之中。他很惊恐，又无法同莉娜商量，便拍一封急电约梅涅赫尔来面商。

彼斯托到车站同弟弟见面。弟弟对他表示全力支持和鼓励，打消了他的顾虑，增强了信心，并商定及早把弟弟调来当博物馆馆长，以便团结在一起大干一番。

彼斯托睡了一个安心觉，第二天精神饱满地去上班。一进办公室看见总工程师在翻阅各地呈上来的建桥投标，然后向过去承包养猪场建筑的胡鲁勃公司通风报信，提出比所有对手都低的造价，等该公司的投标被市政府接受后，再从中渔利。这样做显然是不合法的，被彼斯托制止了。市长立即把彼斯托找去，旁敲侧击，摆出了许多利害关系，以总工程师往后太忙为由要彼斯托让他先看投标。彼斯托只好照办，可是对他们明目张胆干犯法的事很气愤，叫秘书彼得尔菲博士马上把勃龙柯伊的家产和养猪场的关系查明。

彼斯托想起头天已同科勒迪茨约好今天到银行办手续，便给银行打了一个电话。不料科勒迪茨不在，也没有给他留话，他明白这是科勒迪茨有意怠慢，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就在这时，他在总工程师办公室看到胡鲁勃公司的职员正在抄录建桥投标的材料，火冒三丈，决心向市长控告，并利用这些把柄来控制他们。然而市长老谋深算，早有准备，为了制服彼斯托，也正在

搜集他的材料。

在市长办公室里，市长和科勒迪茨小骂了几句总工程师，平息彼斯托的怒气，并代勃龙柯伊·弗利夫妇邀请他参加在那幢别墅举行的告别晚宴，还请他的妻子也顺便去看看房子。

彼斯托始终摸不透老市长和科勒迪茨一伙人的真正意图，梦想事情能往好的方面发展。他想从贝尔奇舅舅卖煤的生意中得到一笔可观的佣金，买下房子，把弟妹和一些亲戚介绍到城里来工作。莉娜的头脑始终比较清醒，她知道丈夫斗不过这个世界，苦苦劝说丈夫。可是，这时候的彼斯托已经任何忠告都听不进去了。

在勃龙柯伊别墅举行的晚宴上，彼斯托一见到玛克托连娜就失去了常态。玛克托连娜却对他若即若离，而莉娜又始终别别扭扭。正在他心烦意乱的时候，秘书彼得尔菲博士悄悄进来告诉他部里来了一位委员，要在今天夜里检查有关养猪场的卷宗，看来是有人告发勃龙柯伊了。彼斯托得到这个好消息后精神为之一振，确信他驾御市长他们的时机已经来临。

果然。市长派秘书来找他，他还没有来得及去见市长，科勒迪茨又亲自来了，对他说，如果他和他的妻子对这幢别墅满意的话，马上就可以正式签署契约。此时此刻彼斯托的胃口太大了，他不满足于一幢别墅，索性向科勒迪茨摊牌，提出安插弟妹和亲戚在本市工作的要求，甚至暗示养猪场帐目有问题，要求成立一个由他参加的三人辛迪加，接收破了产的养猪场，等等。科勒迪茨见彼斯托要价太高，找个借口同老市长商量对策去了。

彼斯托已经忘乎所以，大胆向玛克托连娜倾吐十多年来思慕之情。玛克托连娜为了稳住彼斯托，有意挑逗他，使他有些忘乎所以，心里飘飘然了，忘记了人们正在算计他。其实，玛克托连娜对彼斯托毫无感情，只是为了达到老市长所说的“在我们还没有把事情办妥之前，别让这个彼斯托偷偷溜走了”。也就是说，在他们做好手脚，把来查账的政府委员对付走之前，不能让彼斯托离开别墅。

等到彼斯托夫妇乘马车离开别墅，路经市政厅大楼时，天快亮了，但市长办公室仍灯火辉煌，彼斯托心里觉得蹊跷，莉娜还以为是工役在打扫房间。他们哪里会料到市长的亲信部下已经整整忙了一夜，把查账的委员打发走了。

彼斯托心里七上八下，毫无睡意，上午八点，准时去上班。他坐在办公室里显得疲惫无力，心中茫无头绪。突然，秘书彼得尔菲博士仓皇失措跑进来报告说，昨天夜里有人来过办公室。

彼斯托这才发现办公桌上的一些文件卷宗被人移动过了。他急忙掏出钥匙打开保险柜，发现有关养猪场的卷宗也被人动用过了。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晚上他们使的是缓兵之计……他感到血一下子全涌到头上来，愤怒得全身颤抖。恰好这时市长派人来召他去一趟，他暗下决心：是算总账的时候了。

彼斯托开门见山向市长提出解决本城重大问题的具体办法，在谈到挽救养猪场的时候，他强调成立三人组成的辛迪加接管养猪场，再由市政厅从贷款中予以补贴。

市长全面出击，逐条驳斥他的建议，说明他的每一个想法都是卑鄙的。

他强调匈牙利是一个由亲戚组成的国家，不仅彼斯托的亲戚应该得到照顾，那些不是他亲戚的人也应该得到照顾。接着他用教训人的口吻说，他之所以能当三十八年的市长，从不落选，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个亲戚安插在市政府机关工作。彼斯托反驳他们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侵吞公款，他们利用的即使不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也是在财务上有联系的亲戚。老市长毫不示弱，随即把话题转到成立辛迪加的事，提醒他彼斯托手里是否有钱。彼斯托说明，可以从贝尔奇舅舅卖煤给市政厅的款项中，得到合理的佣金，来筹集所需的资金。老市长听罢无情地揭穿了贝尔奇买空卖空的把戏，宣布已查明贝尔奇以次充好，把泥炭当作好煤卖给市政厅。彼斯托顿时感到天旋地转，看到自己现在完了，被亲戚拖累了。

他霍地跳起来，像是抓住一根稻草，声嘶力竭地喊叫：

“昨天夜里，有人闯进我的办公室，用私自配的钥匙打开我的保险柜，偷走了养猪场的卷宗。”

市长用蔑视的眼光打量他，公开宣称是他命令人去搜查的，并从桌子上拿起一串保险柜钥匙说：

“检察长先生，那是我的保险柜，我只不过把它放在检察长的办公室罢了……”

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彼斯托感到自己快窒息了，一切都化为乌有，计划和一切希望全完了，生活也完结了。

他意识到自己掉进猛兽群里了。他们把他骗进陷所里，他太不留神了，还不习惯于同骗子决斗。在这同时，他不禁们心自问：他果真是一个诚实的人么？他不想干他们所干的事情么？

老市长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只顾批阅文件，仿佛他不存在似的。

彼斯托站了起来，想说点什么，可又想不出该说什么，只鞠了一躬，走了。

科勒迪茨从另一个房间走进市长办公室，提醒市长不要把今晚到玛克托连娜家吃饭的事忘了，并说：

“你真高明！”

市长捋着稀疏的胡子，夸奖彼斯托是他在位期间遇到的最有才干的人：

“这家伙明天会回来的，将来会证明他是个有用的人材。”

市长和科勒迪茨一致认为，彼斯托加入他们一伙后，会是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并商议由市长的女婿、科勒迪茨的儿子和彼斯托组成的三人辛迪加接管养猪场，继续营私舞弊。

就在这个时候，彼得尔菲博士疯也似地闯进市长办公室，报告检察长已开枪自杀，生命垂危。

市长愤怒地盯着彼得尔菲，命令他快去把整个医院动员起来抢救，又对自己的秘书说：

“马上给那个寡妇……，就是他的可怜的妻子……，送去五百庞克。”

“我再加一百，”科勒迪茨说，“这种时候是需要钱的。”

说完，他们都匆忙去抢救那个可怜的人去了。

《亲戚》产生的社会背景同一九二九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对匈牙利的冲击，以及当时匈牙利社会结构所暴露出来的无法解决的危机有密切联系。其时，匈牙利面临严峻的局面，国民收入锐减；农业工人极端贫困，农村里儿童死亡率高得惊人，一家几个孩子合穿一条裤子和一双鞋子已成为常事；

成百万人失业，即使有工作的人，领到的工资还不及一两年前工资的半数。在匈牙利，这一危机是以它特有的方式出现的：当权者拚命把危机造成的损失转嫁给劳动大众。当时，社会上贪污腐化、偷盗行贿成风，欺蒙拐骗事件层出不穷，社会道德一落千丈，具有半封建性质的匈牙利社会结构中所潜伏的各种固有弊病和祸害再也无法掩盖和隐藏了。这一切都说明这个社会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救药，该是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亲戚》就是在这种状况下直接描写匈牙利当时社会生活最成功的一部小说。

在《亲戚》里，莫里兹着重塑造了一个具有两重性格的典型人物——彼斯托。他出身破落小贵族家庭，从小生活贫困，但富有正义感，青年时代曾立志为穷人谋福利。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当上市检察长，地位上升了，思想也随之改变。他放弃了为民谋福利的理想，转而想用所谓正当的手段巩固自己的地位，并增加自己的经济收入。但是，当时匈牙利社会的特征是“一个亲戚和贪污的泥潭”。统治阶级正是利用这种密如蜘蛛网似的社会关系，牢牢控制着国家机器，从这个“泥潭”里吮吸劳动人民的血汗。人们要么在这个“泥潭”里跟他们同流合污，要么被他们窒息死去。掌握全市命运的老市长、银行总经理和大贵族地主要彼斯托俯首听命，不许有任何越轨行为。而彼斯托固有的弱点，加上想要帮助弟弟妹妹和穷亲戚的家族观念，开始时无法抗拒他们的引诱，后来又沒有勇气顶住他们的逼迫，最后愧见妻儿，开枪自杀。

莫里兹借助彼斯托个人悲剧的描写，对统治阶级的代表如老市长、银行经理等人的暴露是极其充分、深刻的。无怪乎小说在报纸上连载时，读者纷纷猜测，书中的市长是不是指某某市的市长，等等。莫里兹对这些猜测只置之一笑，说：“谁穿着这件外套不合身，就别穿在身上。如果好奇心使您憋得难受，您可以大胆地认识一下您自己，因为我的意图是用它来唤起良心……”这就说明，书里的约拉特诺克城并不是哪一座确定的城市，而是当时整个匈牙利社会的缩影，里面活动的人物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亲戚》的思想意义甚至超越匈牙利国界。一九四九年这部小说第一次被翻译成罗马尼亚文出版时，罗马尼亚的文艺评论家指出：它的活动舞台和人物在三十年代的罗马尼亚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遗憾的是，莫里兹并没有真正看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对他所寄予希望的较为正直、规矩的破落中、小贵族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仍抱有伤感的惋惜。这反映了莫里兹世界观的局限性，他虽然深深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处境，但对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的工人阶级和它的历史使命，缺乏深刻的了解。所以，他的作品里的主人公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也说明为什么他作品里主要人物的命运大多以悲剧告终的原因。

### 《强盗》

《强盗》是莫里兹后期创作的重要作品，于一九三七年出版。这部小说以十九世纪匈牙利农村为背景，描写一个青年农民不堪忍受封建社会的压迫和贫穷生活的折磨，走上反抗的道路，最后跟同伙们一起逃亡美洲的经过。

贵妇人蒂阿站在窗前，凝视着离伯爵庄园不远的芦苇丛。窗外，傍晚的紫光沉重地压在芦苇丛上，反射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光辉；蒙蒙细雨像一层厚厚的玻璃罩，遮挡着芦苇丛后面时隐时现的秘密。芦苇丛里，野禽时而长鸣，

时而尖声呼号；今人恐惧的声音不断掠过芦苇丛上空。

蒂阿对这里的生活感到陌生、不可理解，把额头贴在窗棂上，陷入命运的回忆中……惟一值得回忆的人，两年前已经故去，眼下这桩婚事……猛然间，她心里感到一种本能的刺激，心房几乎停止了跳动。一个陌生的男子躲藏在那里，用一双火热的锐利眼睛窥视着她。蒂阿合上眼睛，心里忐忑不安；关于这一带地区流传着强盗出没的故事，她是不大相信的。当她睁开眼睛时，那个人头已经隐没到神秘的黑暗中去了。

蒂阿是位年轻寡妇，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同安多罗伯爵认识，现在是以伯爵未婚妻身分来这座庄园做客的。这一瞬间的景象，使她内心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觉得自己处于一种没有保障的地位。这时，使女推门进来请她去用晚餐。

蒂阿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装饰得十分富丽堂皇的大厅。她未来的公公亚隆伯爵兴高采烈地招呼她，仿佛是这位未婚儿媳的情人；未来的婆婆是一位肥胖的女人，长着鹰钩鼻子，皮肤有些发黄，对任何人都摆出一副冷淡的脸孔，对蒂阿也不例外。她的未婚夫安多罗从来不使她难堪，她也从来没有给过他爱情。在蒂阿的印象里，他有点像他的母亲。

晚餐已经准备好了，亚隆伯爵把蒂阿引到桌子旁，伯爵夫人却阻止说：

“我们稍微等一等，亲爱的，总管还没有来呢。”

蒂阿暗自忖度：总管的迟到，会不会跟那秘密出现的人头有某种关系？

亚隆伯爵殷勤地把蒂阿让到壁炉旁精致的圈椅上坐下，伯爵夫人和安多罗也过来跟她攀谈。蒂阿正考虑要不要把刚才看到的一切讲出来……就在这个时候，总管和他的妻子来了。总管长着一张红红的狐狸脸，是个虐待下人、盘剥佃户的能手，却深得亚隆伯爵一家的赏识。总管夫人温柔、美丽，显然比丈夫年轻多了。

经过一阵寒暄，亚隆伯爵就催促大家入席。

蒂阿没有心思品尝仆人一道接着一道端上来的山珍海味，时不时用眼睛盯着厅门，心里在责备自己没及时将芦苇丛里出现的怪事告诉他们。

正当他们在相互劝酒时，大厅的门推开了，强盗出现在大厅门口。

“不许动，谁想保住性命的话。”

蒂阿认出，刚才在芦苇丛里出现的就是这个头颅，在黑暗中闪烁的也是这双眼睛。她心想，这恐怖的场面是不是预先布置好的呢？

强盗从容不迫地举起枪，拉开扳机，说：

“把钱都放到桌面上来！”

强盗身后又出现一个农民模样的人，神色紧张地盯住他们，摆出一副随时都可以射击的架势。

在强盗的威逼下，安多罗乖乖地把装有三百块钱的精致钱夹子放在桌上，总管也把那装满现钞的沉甸甸的钱袋交出来。

强盗拿到钱后，并没有马上离去的意思，只见他脸上略带笑容地说：

“你们对客人连一杯酒也不招待，这对我来说，实在是难于接受的。”

强盗强迫总管为他斟酒，并要在场的人跟他碰杯，还毫不客气地坐下来用手抓起一只鸡腿，放在嘴里大嚼起来。

气氛稍微缓和了些，接着，强盗同伯爵和伯爵夫人开始了一场舌战。

伯爵夫人首先带着自负的口气追问：

“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难道不害臊？为什么要抢走别人的东西？”

强盗放下酒杯，微笑地说：

“每个人都有他找钱的地方。要知道，这就是我的本行呀！”

“不知羞耻的流氓，……把钱拿回来，否则就把你吊起来。”

强盗不动声色，说：“你听着，这是一桩两厢情愿的买卖。一方愿意给，另一方愿意要，就像你们放债那样。”

当强盗说出自己就是大名鼎鼎的强盗约斯卡时，亚隆伯爵几乎瘫了；安多罗已经半死不活，一双眼睛流着眼泪；只有蒂阿勇敢地等待着子弹射穿她的头部，夺去她的生命……强盗仍谈笑自若，显得很悠闲，自言自语地说：

“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像这样精美可口的菜肴，我还没有尝过呢……这不是一件小事……跟庄园外面的人们有很大的区别……我不愿意让我的同伴都陷入危险的境地……”

接着强盗把伯爵们奚落一番后，又逼着管家承认自己是狗，“专为有权势的人效劳”。

强盗又盯着蒂阿，仿佛只有他们俩才是知音似的。他温情地望着她的眼睛，好像是向她表示：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讨取她的欢心。

“那是金子的吗？”蒂阿指着强盗手腕上的金链子问道。

蒂阿同强盗搭讪使大家都很吃惊，蒂阿自己也吓了一跳。强盗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蒂阿，顺手脱下金链放在桌面上。蒂阿真想伸手去摸一摸，但当她瞧见那男人又粗又大的手臂时，就不动了。只有干体力活的人，才会把金链磨损成现在这个样子。于是她用一种讽刺的口吻问道：

“你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偷来的吗？”

强盗微笑着轻声回答：

“不，……不是偷来的……是抢来的哪！”

起先蒂阿还以为他是一位匿名隐姓的花花公子，现在她完全明白了，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她便带着傲慢的神态观察他，嘴角稍微动了动，镇定地说：

“那也是一样的。”

伯爵夫人很不满意蒂阿这种冒险行为；安多罗显得激动和紧张；亚隆伯爵坐在强盗和蒂阿中间，嘴里喃喃些什么；总管仍然缩作一团。总之，大家都以为最后的紧张时刻到了。

强盗反而友善地端详着这位年轻美貌的少妇：

“不，这是完全不同的。要知道，偷，这并不是老爷们的行径。你们也是不偷的嘛！”

强盗发现餐桌中央摆着一只金杯，顺手抓起金杯和金链子，命令总管递过去给他的同伴。

“喂，都看见了吧，……它已经是属于我的了……难道说这也是偷的吗？”

“偷的！”蒂阿冷冷地说。

“如果我在你们入睡后，偷偷地走进房间，把我看见的东西都放到口袋里去，然后悄悄地走开，那才算偷。但现在，我是当着你们的面把它拿走的。你们胆敢抓住我的手吗？……”他四下看了看，然后一本正经地说：“你们想想，这能叫做偷窃吗？”

“这只金杯是我祖传的物件！”伯爵夫人尖叫起来。

“它是你从祖先那儿继承下来的吗？……你的祖先是不是五金匠？”

“是国王恩赐给他的！”

“国王又是从哪里弄来的呢？国王也是五金匠吗？是他打造的？”

大厅里又寂静下来，因为谁都没有兴趣跟他争辩。可是，强盗仍不放松地往下说：

“为什么国王不把金杯赐给我的祖先？……他们只知道从我祖先那里搜刮财物，连小小的东西也不放过。”

他愈是往下说，声调愈是激昂，最后干脆变成了叫喊：

“我从做孩子的时候起，就经历过这一切了。稽征员不是同警察一起来的吗？不都是带着枪？难道他们不是像蚂蟥那样吮吸我们的鲜血？把一袋袋麦子抢走的，不正是他们吗？嗯，难道说这不是偷盗、抢劫？”

“那是执行法律！”伯爵夫人也叫喊起来。

“法律……难道法律规定世界上的穷人穷一辈子？祖祖辈辈穷下去，直到世界末日？富人永远是富人？难道说这就是上帝的第一个法律？”

强盗驳斥了伯爵夫人污蔑穷人不爱劳动、游手好闲的谰言，指出伯爵一家是靠剥削农民过花天酒地生活的。他们为伯爵翻半公顷土地，才得到七个铜板的工钱，而一天没有十个铜板是无法过活的。反过来要是让伯爵翻地的话，他连五个铜板也挣不到。对于蒂阿企图通过对农村田园牧歌式的描叙和歌颂来规劝他改邪归正，回到乡村去从事劳动，他却嗤之以鼻，用事实反驳了蒂阿的看法。他指出在农村只有有钱人才被认为是好人，而穷人则被说成是坏蛋，就是这个不公正世界的逻辑。

蒂阿辩不过强盗，便骂他是蠢东西，过着“不道德的生活”，要他把钱放回到桌子上，立刻离开。

强盗愈是贪婪地望着她，内心愈感到不安。他无法想像，蒂阿怎么会跟自己妻子在世的时候一模一样呢？他曾经多次对妻子说，除了使用强力外，没有别的办法。那时妻子也是这么骂他的。后来她病死了，他以为从此可以自由了。没料到眼前又出现一个女人；她身体虽然纤弱，意志却像他的妻子那样坚强。

蒂阿想站起来走开，强盗突然怒吼着命令她坐下。她受不了一个鲁莽的农民向她下命令，用眼睛暗示安多罗保护她；然而只是在强盗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手枪的时候，安多罗才哆哆嗦嗦站起来叫强盗冲自己开枪，接着像被判处死刑似地坐到原来的座位上，脸上没有半点血色。

蒂阿便冷冷地、强硬地对着强盗叫喊：

“你的罪过比抢劫还要大，因为你想要扼杀灵魂。……你想要把我们变成你的仆人……在你将要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之前，我要告诉你我对你的意见……”

她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强盗走去，站在他面前，盯住他的眼睛，照着他的脸打了一巴掌。

几乎是同时，强盗从他的同伙手里接过武器，扣动扳机，子弹砰的一声飞了出去。

跟着大厅里又是死一般的寂静。

强盗摆摆手，向他的同伙示意；不一会儿，他们就从门口那里消失了。

这时，安多罗伯爵赶忙走上前去扶住摇摇欲坠的蒂阿。

“放开我！”蒂阿说。她并没有受伤，由于精神上受到刺激，无力地倒在安多罗伯爵怀里晕过去了。



约尼是个青年农民，居住在离布达佩斯约三百公里的一个穷乡村里。他家中上有父母，还有两个未出嫁的妹妹和两儿一女，却无半分土地，全靠替地主当雇工过活。一年前妻子病死后，他在家里实在呆不下去，就外出到布达佩斯做工。他的工钱很少，省吃俭用，挤出点钱寄回乡下，勉强养活七口之家。

由于生活所迫，约尼加入一个劫富济贫的强盗集团。那天晚上，约尼跟一个伙伴在伯爵庄园作案后，无法再在布达佩斯呆下去。按计划约尼负责率领一批命运相同的人一起逃往美洲谋生。他对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老父母和幼儿幼女放心不下，出走之前，无论如何要回去见他们一面。

案发后，全国都在追缉约尼和他的同伴。因此，约尼只好绕一个大圈，走了好几天才到家。

那是十一月的一个黄昏，天色阴暗，道路泥泞不堪，每走一步，都得用力把靴子从地里拔出来，跟着下一步又重新陷入那厚厚的、黑得发臭了的烂泥里去。教堂高高的尖顶仿佛要吞噬掉整个村子。晚上，所有的门窗都是黑魆魆的，人们都呆在屋后的小房子里，在一盏小豆油灯或煤油灯旁，或干脆就着灶里燃烧着的木柴的昏暗的光干活；村里那些用烂铁皮或茅草做屋顶的低矮房屋，总是那样不和睦地拥挤在一起。

走着走着，约尼心里想：“人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呢？”他的生活不是比这里的烂泥还糟糕吗？为什么还要回来呢？他带回家来的只是穷困和恐惧。在人们中间没有他立足之地。

离家的时候，他是一个失去妻子的人，现在回来了，又好像成了一只被人们追打的丧家之犬。然而，在庄园见到的那个美貌少妇，使他感到内心深处有一股莫名其妙的火焰在燃烧，犹如席卷森林的烈火虽然被扑灭了，但残烬仍在冒烟。

他想，要是上帝恩赐给他这样一个妻子，他会感到满足的。当然，穷人无论如何讨不起像她那样的女人。不过，可能的话，他会娶她的……但愿上帝真的对穷人发慈悲……遗憾的是没有这样的上帝。

他惟一感到轻松的是，已经把金杯邮还给那个美人，还附去自己的那条金链。……卡斯里蒂·保罗夫人，邮包上面是这样写的……由他口述，邮局职员代笔的。

他肩上的皮囊里有许多钱，他把钱全装在一个密封的玻璃瓶里。假如被人认出来，一切就完了。他是不害怕绞刑架的，只担心孩子们要替他背上坏名声，还有那位漂亮的少妇……

他终于走到自家门口——一间低矮的房屋门前。他差点认不出它来了。他离家时，门口还有一排篱笆，可现在许多枝条已经被抽掉，八成是当柴烧了。

他急速地敲打着屋门，紧跟着就把它推开了。因为屋里黑魆魆，只听到有人从里屋出来，接着传来母亲的声音：“……约尼，是你吗？”

他突然感到心头紧缩了一下。难道母亲在黑暗中也能将儿子认出来？或者是她呼唤儿子已经成了一种本能的习惯？泪珠不知不觉地从他的眼眶流下来。

母亲迫不及待地黑暗中摸索到儿子身边，紧紧拥抱他，亲吻他；他嗅出母亲身上散发出一股浓烈的汗臭味。

这时，父亲点亮了油灯。老人家头发全斑白了，光着脚，穿一身脏得发

黑的衬衫和裤子，额角和脖子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皱纹。

最后，轮到孩子们拥上来搂住他的脖子亲热。天伦之乐使他暂时忘却心中的苦恼。

母亲告诉他，大妹妹约菲又要生孩子了，连做尿布的旧衣服都没有。为了省油，二妹妹约里斯卡到点灯的人家做针线活去了。当童养媳的小妹妹芭莉，接回家来的时候，被婆家的人虐待得只剩下一口气。这时芭莉正坐在铺在地上当床用的一堆稻草上，呆呆地望着人，头上连一根头发也没有了。约尼非常气愤，倘若这时小妹妹婆家的人在他面前，他会杀死他们的。

他向母亲要点吃的。母亲对他说，面包是没有，只有一些葱。孩子们是吃大葱当晚饭的。

母亲死死盯着他带回来的皮囊，老问里头装着些什么东西。他只好从里头掏出一块大面包和一节香肠。全家老小像饿狼似的，转眼工夫把面包和香肠全吃光了。

父亲默默无言，戴上破帽子出门后，母亲仍缠着他的皮囊，趁他不备的时候，把手伸进皮囊，还说她摸到一只密封的玻璃瓶。约尼又气又急，冲母亲大吼：“你最好不要碰它，明白吗？”老妇人似乎醒悟了，紧紧抓住儿子的手。但她仍以惊异的目光盯住那只皮囊。约尼把里头的衬衫和零星食物全拿出来后，母亲才罢休。约尼把皮囊高高挂在墙上，正考虑是否安全的时候，一个乡警推门进来了。

乡警在出来巡逻的同时，顺便进来看看他的未婚妻约里斯卡。他看到墙上挂的皮囊，一定要拿下来看看，因为上司有命令，对每个旅客的行李和证件都要检查、核实。全国各地都下了通缉令，出两千块赏钱捉拿强盗约斯卡。乡警对这笔赏钱垂涎欲滴：“为了这两千块钱，就是强盗的母亲也会把他交出来的。”并夸口说，他当时若在老家（安多罗伯爵庄园附近），这两千块钱他就稳拿了。约尼从皮囊里拿出一件漂亮衬衫，勾引了乡警的心事。他虽有薪水，但父母都是穷人，担心如果不能为新娘买足衣物，约尼的父亲可能就不肯把女儿嫁给他。他没有心思再去查看皮囊，叫他的警官到别处去执行任务了。其实约尼也有思想准备，万一乡警摸出皮囊里的玻璃瓶，他是会用桌上的尖刀扎死妹妹的未婚夫的。

第二天一大早约尼的好友安德烈来打门。他打算组织一支伐木队，凑不够钱数，来邀约尼入伙。他以为约尼从佩斯回来，肯定会有钱。约尼很为难，他寻思：要是把钱拿出来，将会有活干，一家人的生活就有了着落。但转念一想又觉不妥，因为他无法解释他何以有这许多钱。

他没有同意入伙，但答应陪安德烈去同林场监护官苏拉洽谈。安德烈像着了魔似地恳求林场监护官把伐木地段让他。

苏拉要安德烈先交钱。安德烈从约尼那里弄不到钱，只好把老婆陪嫁来的土地押出去，凑足一笔钱交给苏拉。

约尼回到家门口，看见母亲腋下夹着一个包袱往外走，说是给刚生孩子的大妹妹约菲送床单去，还说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约尼大吃一惊，他拿回来的还有一整个大面包呢。母亲承认，“是的，不过那个面包我已经给约菲拿去了。我可半口也没有吃。我马上给你拿一些回来。”他进屋掀开床上的铺盖，发现床上空无一物，他妻子身后留下的衣服、被单，全都不见了。再看看那些孩子，全在地上翻滚打闹，有时还用舌头舔身上的脓疮，他气愤极了，这是狗一般的生活呀！如果老是这样下去，他宁愿先杀死自己的孩子，

然后再上吊。

约尼草草吃过晚饭，倒头睡下，醒来时听说村里出了乱子。他操起一根短棒，朝村公所跑去，远远就看见那里站着一片黑压压的人群。他突然觉得周身的血液在沸腾。他从来没有看见过村公所前面聚集过这么多的人。他从几个农民那里知道，村民是为那块林场和牧场的事来同村长讲理的。原先那里是一片沼泽地，一八四八年前，贵族地主驱使村里的农奴去排干沼泽。一八四八年解放农奴时，这块土地变成村里的公地。人们在那里打柴，放养牲口和家禽。可是现在过了四十八年，老贵族地主的后代拿出地契，要把它占为己有；因为按照法令，在五十年之内，原主可以收回过去的地产。

起先约尼觉得这件事跟他关系不大，因为他既没有牛羊也没有鸡鸭。可是相同的命运使他很自然地站在穷苦农民一边。尤其是当他听说林场监护官事先知道要收回土地，骗了安德烈的钱后，连夜卷逃时，气愤极了，恨不得一下子把苏拉打死。

人群越聚越多，没有领头的，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有些人只是拿胆小怕事的老人出气。

约尼如梦初醒，挺身而出：

“林场是村里的。牧场也是村里的。”

“对呀！对呀！”群众在怒吼。

“土地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土地是属于上帝的。上帝只把土地赐给那些照管土地的人们。土地是属于耕种土地的人的。”

他的话音刚落，人群中立刻爆发出狂热的欢呼。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叫喊：警察！村民默默地给一队骑马来弹压的警察让出一条道。大伙对列队站在村公所门前的警察，投去愤怒的目光，然而已经有一些人打算溜走了。约尼一直站在一条石凳上，比大伙高出一个头。他镇定地发出洪亮的叫喊：

“大伙全留在这儿，谁也不要走！”

瞬间，人们都自觉地站住，同时有人伸手拉了约尼一把，他很快就隐没在人群中。

正当骑马的警官要驱散人群时，首席法官乘坐一辆轻便马车来了。人群下意识地闪开一条道，让他的马车径直往村公所大门驶去。他先是责备村长和村文书没有尽职，要村长向村民宣布将土地归还契约持有者的法令。

村长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深知自己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在愤怒的村民正高喊要打死他的时候，他是死活不肯出去的。

首席法官只得亲自出马。他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上，命令人们摘下帽子。一瞬间，上千的人都不自觉地从头上摘掉帽子。只有约尼一个人没有脱帽，站在那里对着首席法官。尊严受到挑战的首席法官命令两个警察去抓他。人们又下意识地给警察闪开一条道，让他们抓走约尼。约尼奇怪地瞧着周围的人们，他们谁也不过来帮助他。他后悔来参与这跟自己无关的事情。可是他被带进村公所大门时，还是转过头来，高声叫喊：

“土地是属于耕种土地的人的！……”

人群这时仿佛才苏醒过来。警察把一个身无分文的人从他们中间抓走，而恰好就是这个人为了大家的利益而呼喊。大伙顿时怒吼起来，拼力冲大门，用石块、泥团往村公所里扔，要求马上放出约尼，打死村长。

束手无策的首席法官走进关着约尼的小房间，看见约尼正在若无其事地

看报，便对他说：

“假如我让你出去，你肯对他们说话吗？”

“要我跟他们说什么呢？”

“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肯出钱，那他们就可以得到土地。”

“不，土地是属于他们的。”

首席法官企图用五霍尔特土地收买约尼，但没有得逞。约尼继续聚精会神地读着那份报纸。报上刊登了强盗把金杯寄回去的消息。报道说，这样一来，就给侦查工作指出了方向，应该在显贵人物中寻找“强盗”，说不定他会将劫去的三万块钱也邮回来呢。约尼关心的那条金链却没有报道，他心里豁然一亮，那个贵妇人没有出卖他，他的心又动了……

外面群情激愤，警察已经弹压不住，首席法官命令再次关闭大门；这时，约尼也趁机溜出大门，混到群众中间去了。

约尼内心深处的火焰正为报纸上的消息燃烧着。为了土地变得发狂了的人群，有的咆哮，有的咒骂，还有人挥舞着棍棒蜂拥而上，不知是谁打了警察局长一棒子。失去理性的警察局长大声命令：

“开枪！”

枪声一响，人群惊呆了，却没有后退，接着第二次枪声又响了。被打死的人倒下不动了，伤者却躺在地上呻吟。密集的人群跑散了。

约尼是惟一站着不动的人。他等待着子弹射穿他的胸膛，但是奇怪的是，他一点伤也没有。过了好一会儿，人们又开始聚集到横七竖八地躺着牺牲者的广场上。村子顿时变成可怕的战场，到处可以听到凄切的哭泣的绝望的呼叫。

约尼整天为伤者包扎，为死者料理后事。这次惨案中有六人死去，十三人受重伤。

晚上，首席法官对约尼说：

“现在，你终于亲眼看到了，那些漂亮口号对他们是没有意义的。”

“首席法官先生，一个老寡妇已经拥有三千霍尔特土地，还想霸占村里的五百霍尔特土地，这怎么能叫人想得开呢？”

“这些事跟你无关……你连一块够埋葬自己的土地都没有呢！”

约尼没有同首席法官辩论下去，他记下了这笔账。他想，他得马上离开这里，蒂阿伯爵夫人……

那天晚上伯爵庄园发生的抢劫案轰动全国。五天过去了，关于那强盗的踪迹，任何线索都找不到。全国的警察倾巢而出，进行搜捕。

蒂阿在事情发生后本想离去，可是总管以种种借口要她留下。她躺在床上已经好几天了。那天晚上强盗的言行举止仍然一幕幕清晰地出现在她眼前。特别使她不能忘怀的，是强盗那些既富有哲理又带有煽动性的话语。她想，他不会是一般的农民，可能是一位显贵，而且整个事情都是精心策划的。会不会是一个爱情故事？想到这儿，她的脸唰地一下子变得通红，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恐惧。要是他现在又出现在她面前，她该怎么办呢？尖声呼救，把他出卖？……她又想起安多罗伯爵，觉得他是个文静、温柔的好人；她自己自幼失去母爱，后来年轻守寡，遇到安多罗伯爵后，希望新的结合能给她带来一种安宁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命运总是在捉弄人，她来到这里不久，一个农民，或者魔鬼才知道他是什么人，又搅乱了她心境的宁静。

正当蒂阿独自一人在床上沉思时，使女罗斯走了进来，递上一个邮包，

并告诉她安多罗伯爵外出还没有回来。蒂阿把使女打发走后，动手拆开邮包，发现里面装着那只被强盗抢走的金杯。她被这意想不到的事情惊呆了，心房怦怦直跳。过了很长时间，他用颤抖的手拿起金杯，发现杯子里还藏着什么东西。她把杯子翻转过来，扣在被面上，一条黄澄澄的链子出现在她眼前……

她吓得双手捂住面孔，包裹从她身边滚落到地上，金杯发出清脆的响声。她本能地伸出左手抓起金链，藏在被子里。她也闹不清楚自己在床上躺了多久，最后才拉了拉挂在床边的铃绳，使女应声进来。

“……快去告诉伯爵……”她惊恐地指着散落在地上的邮包。

使女一眼认出那只金杯，立刻尖叫着跑出房间。

整座庄园顿时沸腾起来。人们叽里呱啦，议论纷纷，话题全集中在邮回来的金杯上。有人说，那个强盗可能是一个显贵，甚至可能是蒂阿的恋人；也有人说，蒂阿所以敢跟强盗搭话，是因为她知道他是谁，可能是合谋夺取安多罗伯爵的财产；有些长舌妇更发誓说，她们早就料到这个陌生女人闯到庄园里来不是一件好事；总之，蒂阿的处境更加困难了。

但是，亚隆伯爵对蒂阿是偏爱的，他仍为消除蒂阿的不安，邀请各方高朋贵客来庄园饮宴作乐。那些贵族老爷太太们大谈特谈各种稀奇古怪的食谱，以及贵族们如何享乐的逸事，兴高采烈，仿佛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幸似的。在他们边吃、边喋喋不休穷聊的时候，仆人把已经离开庄园好几天，跑到乡下农民中间寻欢作乐被打伤的安多罗抬进来了。这使大家更为惊讶和愤怒，异口同声把这一切不幸都归咎于蒂阿；同伯爵有亲戚关系又是安多罗情妇的团长夫人用敌意的目光盯着她；连同安多罗有瓜葛的使女罗斯也敢当众声嘶力竭地叫喊，哭闹；同安多罗有暧昧关系的华伦斯丁伯爵夫人醋意更浓，不顾自己丈夫在场破口大骂：“各式各样的强盗姘妇都给我滚出去！”蒂阿终于气得昏倒在地。使女把她搀扶回房间，替她脱衣服时，又在她身上发现那条金链，这样一来，蒂阿不仅身败名裂，还成了警察局的嫌疑犯。

其实，安多罗并没有受伤，只是额角上碰破了点皮。仆人替他刮脸，梳洗打扮；他同罗斯调够了情后，打发她去请蒂阿骑马出游。蒂阿意识到自己已经陷进无法申辩的窘境。她认为安多罗是位可爱的好人，会把她从危难中搭救出来，便把自己从前幸福的夫妻生活和守寡期间几位年轻、有教养的人，对她的追求以及接到邮包的事无保留地向他倾诉，表示她把他看作自己终身的神圣伴侣。没料到安多罗突然问她：“过去曾经有过嫉妒没有？”原来安多罗不仅嫉妒她故去的丈夫，连对强盗也怀着浓烈的嫉意。她还发现安多罗完全根据不同的法律观念来考虑生活、家庭和爱情，不免担心他能不能在她遇到不幸的时候给她以帮助。眼下为侦破抢劫案，检察官限制她的行动自由，安多罗却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她感到庆幸的是安多罗从不要求同她亲近，遂下决心不同他结婚，只想得到他的帮助，以求摆脱目前的处境。

官方对蒂阿的调查正加紧进行，使女罗斯和总管提供了对她极不利的证明。为了保全面子，亚隆伯爵突然宣布，他的儿子安多罗次日将带着未婚妻，赴维也纳举行婚礼。他说，那天晚上的事，是安多罗为了取得蒂阿的欢心想出的恶作剧，他们已经根据骑士的习惯，按照家规给以处理了。

那是一个秋末的黄昏，蒂阿独自一人坐在圈椅上出神。她惟一要等待的是第二天的早班车，她可以回家，回家了！她在朦胧中觉得有个既不像仆人不像是伯爵的陌生人站在她面前。她定睛一看，啊，原来是那个强盗！

强盗在笑。他那排漂亮、整齐的牙齿在闪闪发亮。他那双敏锐的蓝眼睛

对着她闪动。蒂阿感觉到心里有一股火辣辣的东西在燃烧，使她失去了力量。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张船票，要她跟他一同到美洲去。他把一双大手放到她的肩膀上，说：“你是属于我的。”就在这一瞬间，蒂阿明白了，这是不可能的。她微微一笑，说：“……我是一个贵妇人。而你需要的是一位能够和你在一起劳动的妻子……我最大的遗憾是配不上你这样一位伟大的英雄人物……”

强盗挨着她，伸出一双强有力的、大熊般的手臂拥抱她，热烈地、深深地吻她。

蒂阿支持不住了，不知道在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在生活里她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清醒。

强盗离开了。蒂阿用钥匙把小提包打开，取出一只小瓶子，把里面的东西倒进一只盛满水的玻璃杯中，然后又坐回到圈椅上，把那杯水一饮而尽。

约尼在维也纳火车站下了车。整个旅途他一直感到很愉快，甚至眼睛也在发笑。他为自己的走运而高兴。他已经不叫恐怖的约斯卡，也不叫亚和·约尼，口袋里的证件表明他叫柯勒格图·贝勒多兰，职业是石匠助手，在德国一家叫梅勒的公司里工作。

来接约尼的人把他领到一家客栈，那里已经有许多匈牙利人在等候着他。原来他们都是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约尼负责带他们漂洋过海去闯世界，因为匈牙利对他们来说是饥饿的故乡，穷人没有自己的土地，法律也不保护他们。因此，他们要到一个“没有伯爵，也没有王子”，“只有劳动，每个人都享有同样劳动权利”的世界去。

约尼问他们：“……朋友们，当你们要离开你们家乡的时候，不觉得遗憾吗？”

“故乡，饥饿的土地！”一个人回答。

“只要是我们能够找到面包的地方，”另一个人说，“那里就是我们的祖国。”

船快开了，约尼从报上获悉蒂阿服毒自杀的消息，他反而沉着地说：

“她要是死去，那对于她来说是最好的了；如果没有死……”

他紧握拳头，敲击着桌子。这一打击是那么令人恐怖，使他全身的血液又沸腾起来了。

《强盗》的故事情节富于浪漫色彩，它以贫苦农民约尼潜入伯爵庄园，在晚宴上抢劫伯爵巨款为开头，中间穿插描写农村的赤贫、愚昧和农民的自发夺地斗争，以及约尼同贵妇人蒂阿的爱情纠葛，直至约尼带领一群同命运的农民逃亡美洲谋生为止，形象地揭示了封建贵族地主同贫苦农民之间有如天渊之别的贫富差距，并由此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

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在匈牙利虽然有了较程度的发展，但其社会生活和政权组织结构仍然处于半封建的落后状态，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真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人口还不到一千万的匈牙利，竟被称为拥有三百万乞丐的国家。大批失去土地、一无所有的农民，出于生活所迫，只得漂洋过海，到美洲去另谋生计。据统计，到一九一四年，匈牙利向外移民的人数已高达二百万人。

《强盗》所反映的就是这一匈牙利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的时期。

在《强盗》里，莫里兹塑造的主人公同他在这之前的作品中，出现的农民形象不同之处在于，他有意识地把约尼描绘成一个敢于行动的英雄。例如，

莫里兹另一部小说《幸福的人》里的主人公尤奥同约尼一样，虽然都生活在极其艰难贫困的环境里，又都是热爱生活、向往美好未来的青年农民。但尤奥对恶势力采取的是逆来顺受的态度，约尼则是反抗封建制度的叛逆典型。约尼认识到社会不正义的根源在于种地的农民没有土地，而且懂得要改变千百年来他们一无所有的悲惨处境，只有团结起来同那些骑在他们头上的贵族老爷们斗争，只有使用武力，也就是革命行动才能改变现状。因此，约尼才敢于在伯爵庄园舌战权贵，把他们污蔑劳动农民的滥言驳得体无完肤。后来他又不顾军警的追捕，不自觉地领导了一次村民夺地暴动，喊出了“土地属于耕种土地者”的口号。这正是《强盗》一书可贵之处，也标志着莫里兹在创作思想上前进了一大步。

夺地斗争被军警血腥镇压下去以后，约尼按原计划同一批共命运的阶级兄弟一起流亡美洲，寻找一个“没有伯爵、王子，只有劳动，而且人人平等的地方”去了。临上船的时候，他们说了一句令人心酸的话：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是祖国。这不能不说是把那伙把人民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远走他乡的统治者的有力控诉。

可惜莫里兹笔下的约尼还是只能采取个人冒险行动，面对整个国家机器，不免显得软弱无力，以至最后只好背井离乡，到异国去谋生。这种解决办法说明莫里兹在思想上依然停留在民主主义思想阶段，还没有看清只有依靠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

在艺术手法上，《强盗》的特点是注意全书的布局 and 整体结构上的戏剧性，诸如强盗突然在伯爵餐厅出现，尖锐而又激动人心的对话，贵族老爷们的奢侈、豪华的生活同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劳动农民的悲惨境遇的描写和对比，约尼同那个年轻贵妇的爱情悲剧等，作者都能利用戏剧的矛盾冲突所产生的强烈艺术效果给读者留下较深刻的印象。

